

〈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 臺灣醫療史與近代史的觀察*

容世明**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以臺灣醫療史觀察為切入角度，並從中考察、理解日本殖民醫學教育的發展。

長與又郎，1878 年出生於日本東京，父親為長與專齋。1904 年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畢業，1905 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任副手，1907 年赴德國 Freiburg 大學、師從 Rudolph Aschoff 進修病理學，1909 年回國。1910 年升助教授，1911 年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年 11 月 34 歲時晉升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病理解剖學第二講座教授，1919 年任傳染病研究所所長，1929 年癌研究會會長，1933 年 4 月至 1934 年 12 月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醫學院院長），1934 年 12 月至 1938 年 11 月任東京帝國大學總長（校長）。1936 年 11 月 28 日入選帝國學士院會員（院士），1941 年 4 月任第一屆日本癌學會會長，1941 年 8 月 16 日因病去世，享年 64 歲，並捐贈遺體供病理解剖。

長與又郎從 1892 年 1 月 1 日 15 歲時開始書寫日記，現存日記手稿起訖為 1893 年 8 月 17 日至 1941 年 8 月 15 日，目前由家屬保存。〈長與又郎日記〉曾於 1983 年 7 月至 1992 年 3 月以期刊連載方式揭諸於世，並於 2001-2002 年彙整成冊刊行出版，供公眾閱覽與研究。

本文分別從三方面分析：一、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二、矢內原忠雄辭退事件、三、劉瑞恆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等面向，來論述〈長與又郎日記〉的價值。其記載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的人事安排，醫學部長候選人主要由時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長與又郎與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協商決定，候選人條

* 本文係民國 102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追尋現代醫學：日治時期臺灣的病理學門」（NSC102-2410-H-182A-001）之部分研究成果與移地研究成果。承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本文，提供諸多寶貴洞見與修改建議，謹此致謝，然本文若有不完備與缺漏之處，當由筆者自負。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解剖病理科主治醫師

來稿日期：2013 年 11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3 月 10 日。

件為新人、並具輩分與實力的「人格者」，最終兩位候選人選，第一人選為三田定則，第二人選為今裕。醫學部長定案後，三田定則再和長與又郎協商醫學部教授人選，和氣巖是首先被確定為病理講座教授。矢內原忠雄與臺灣關係密切，除了學術著作，也與林獻堂等人有交誼，日記記載矢內原忠雄辭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之前，相關會議協商等史料。長與又郎也記錄其與劉瑞恆及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拉西曼（Ludwig J. Rajchman）會晤商談。其社會角色具備多樣性，日記涵蓋時間為1893-1941年，約48年，提供臺灣歷史學者研究參考的豐富史料與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日記、臺北帝國大學、長與又郎、矢內原忠雄、國際聯盟衛生組織

- 一、前言
- 二、長與又郎的生平簡歷與日記概要
- 三、〈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舉例
- 四、〈長與又郎日記〉材料的價值及其侷限性
- 五、結論

一、前言

日記不僅記錄個人的生活，也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手珍貴史料。透過日記，不但可研究記主個人想法、生活、事業，乃至家庭與家族史等，也可反映出當代人的處境等，是研究歷史、社會、教育、文化、經濟、政治、醫療等議題的重要素材。但隨著近年來重視研究倫理，使用日記或訪談等資料，須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並要求該研究不會對日記中之人物或其後代等之權益造成負面影響。在符合研究倫理的前提下，日記史料的運用豐富了臺灣史研究的多面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十多年來陸續規劃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系列、¹《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²《簡吉獄中日記》、³《黃旺成先生日記》系列⁴等，上述日記與《水竹居主人日記》、⁵《呂赫若日記》、⁶《吳新榮日記》、⁷《楊基振日記：

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2000-2004）；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廿七）》（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0-2013）。

²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9）。簡吉著、簡敬等譯、陳慈玉校注，《簡吉獄中日記》（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5）。

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十二）》（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2013）。

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0-2004），共10冊。

⁶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4），共2冊。

⁷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2008），共11冊。

附書簡·詩文(上)·(下)》等的出版,⁸ 提供研究者多元的第一手研究素材,增添豐富的史料,並推動相關研究的成果呈現。近年陸續舉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等研討會與出版論文集,⁹ 並建置臺灣日記知識庫將史料數位加值供研究使用;期刊《臺灣史研究》近年亦有刊登與日記研究相關的論著。¹⁰

日記與臺灣醫療史研究方面,則有陳宏文翻譯《馬偕博士日記》,¹¹ 范燕秋著〈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¹² 2004年11月27-28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¹³ 與2010年8月19-20日「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等,¹⁴ 日記史料運用於身體與醫療史研究方面,已有初步成果。至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日籍人士日記¹⁵ 與臺灣史的相關研究,則尚有待開發。

⁸ 楊基振著,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下)》(臺北:國史館,2007)。

⁹ 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10年8月19-20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合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16-17日,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於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

¹⁰ 例如廖振富、張明權,〈〈傳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3(2013年9月),頁125-175;莊勝全,〈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臺灣史研究》20:3(2013年9月),頁207-220;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臺灣史研究》19:3(2012年9月),頁201-236;廖振富,〈〈傳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2011年12月),頁201-239;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18:1(2011年3月),頁185-216等。

¹¹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出版社,1996)。

¹² 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收於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731-789。

¹³ 范燕秋的論文〈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共衛生之運作〉和〈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就醫行為〉,發表於2004年11月27-28日舉辦之「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參見范燕秋,〈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共衛生之運作〉,收於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第2版),頁155-183。

¹⁴ 賴玉玲,〈日治臺灣社會菁英的文明觀與文化認同:黃旺成的醫療經驗觀察(1912-1921)〉,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¹⁵ 包括樺山資紀「台灣記事」(自筆4冊)與「日記」(墨書6冊)史料、《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的翻譯出版,以及日本藤原書店預定出版《後藤新平日記》全卷等。參見〈樺山資紀關係文書(その1)〉(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戴國輝,〈近代日本と中国(4):樺山資紀と水野遵〉,《朝日ジャーナル》14:5(1972年2月),頁31-38;林呈蓉,〈樺山資紀「日記」與水野遵「臺灣征蕃記」的史料價值與意義〉,《臺灣史料研究》20(2003年3月),頁156-177;〈後藤新平(1857-1929)とは…〉,「藤原書店」,下載日期:2013年11月9日,網址:http://www.fujiwara-shoten.co.jp/shop/index.php?main_page=index&cPath=102_121。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於 1936 年創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任部長為三田定則。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先於 1897 年在臺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設立於 1899 年，1919 年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7 年更名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6 年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¹⁶ 三田定則來臺前是東京帝國大學法醫學教室名譽教授，他接掌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後，希望未來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學府，並從日本招募人才來臺擔任醫學部教授，原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中只有 5 位成功轉任醫學部教授，包括橫川定與杜聰明等。¹⁷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中提到「三田定則其東京帝大出身的優越感，將日本學閥惡習引進臺灣，造成醫專的日人教授間失和……校友會亦自此分裂為東寧會，南溟會及景福會，互不往來。」¹⁸ 雖然如此，但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教授師資，之後陸續承辦日本全國性各醫學領域學會的學術年會會議，並擔任相關學會會長，這也是三田定則人才招募識人之明的表現。¹⁹

有關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從教育史、科技史、殖民政策、戰後移轉的角度出發，已累積不少成果。²⁰ 對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研究，范燕秋〈帝國政治與

¹⁶ 堀內次雄、丸山芳登著，邱鈺珊等譯，〈臺灣醫事衛生年表〉，收於張秀蓉編註，《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49、52、70、74、78。Michael Shiyung Liu,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9);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主要原因為，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位居戰勝國聯盟，期間經濟成長與財政收入增加，1918 年原敬就任內閣首相時，提出教育擴張政策，配合原內閣政策，文部省制定「高等諸學校創設及擴張計劃」，醫學方面則擴充醫學專門學校與醫科大學。例如 1915 年日本官立高等院校為 41 所，在此政策之下 1925 年日本官立高等院校增加為 91 所，10 年內學校數目增加 2 倍。受惠於此，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升格成為醫學專門學校，參見天野郁夫，《高等教育の時代（上）：戰間期日本の大学》（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頁 117-131。

¹⁷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97），頁 47。

¹⁸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 年）》，頁 110。「南溟會」是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日籍畢業生所組成的校友會，「景福會」則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與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所組成的校友會，「東寧會」是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生與師長所組成的校友會。

¹⁹ 例如在臺北舉辦的 1939 年第 13 回日本藥理學會總會、1940 年第 48 回日本解剖學會總會、1941 年第 26 回日本法醫學會總會等。

²⁰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頁 149-175；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

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從醫學部設立、講座人才選定、講座研究方向、熱帶醫學等，探討帝國政治在殖民地的權力擴張，與在地科學研究社群的形成，其中並提到「醫學部講座教授主要是日本國內醫學人才再次轉移、而且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擴展學術地盤的場所。」²¹ 有關三田定則出任第一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醫學院院長）的史料，陳天機與李鎮源撰〈法醫學者：三田定則教授〉一文，述及「1936年1月23日臺北帝國大學新設醫學部，東京帝國大學資深名譽教授林春雄（藥理學）與長與又郎（病理學）推薦三田定則教授擔任醫學部長，由臺大總長幣原坦先生出面邀請聘任」。²²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醫學部長人選產生與醫學部教授的遴選過程，在長與又郎的日記中被記錄下來。為了向學界介紹該史料，故撰述此文，野人獻曝，供學界參考，並兼述〈長與又郎日記〉的史料價值。

二、長與又郎的生平簡歷與日記概要

（一）長與又郎的生平簡歷

長與又郎的父親長與專齋，曾任「東京医学校校長」（1874-1877）與「東京大学医学部心得」（1877-1879）。²³ 長與又郎出生於1878年，是長與專齋的三男，當時長與專齋為內務省衛生局長。1902年（25歲）父親過世，1904年（27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1905年1月入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任副手，3月升助手。²⁴ 1907年7月（30歲）前往德國 Freiburg 大學、師從病理學教授 Rudolph Aschoff，²⁵ 進修病理研究2年後回國。長與又郎1910年升任助教授（副

²¹ 范燕秋，〈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年12月），頁89-136。

²² 陳天機、李鎮源，〈法醫學者：三田定則教授〉，收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編，《臺大醫院百年懷舊》（臺北：該院，1995），頁18。

²³ 小高健，〈長與又郎：日本近代医学の推進者〉（新潟：考古堂書店，2012），頁18-25。

²⁴ 山極勝三郎，〈本誌創刊以來ノ本邦病理學ノ沿革及發達（本邦病理學病理解剖學廿五年史）（附二圖）〉，收於望月泰三編，《東京医学会創立廿五年祝賀論文（第1輯）》（東京：東京医学会事務所，1913），頁53-111。

²⁵ Rudolph Aschoff 是德國病理學家，也是近代病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當時世界各國學者經常去他研究室進修，他也是日本病理學會名譽會長。當代臺灣病理學之父暨中央研究院院士葉曙於《病理卅三

教授），1911年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年11月（34歲）晉升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病理解剖學第二講座教授。1915年任癌研究會理事長，1919年6月4日（42歲）擔任傳染病研究所所長，1929年4月3日為癌研究會會頭（會長），1933年4月（56歲）至1934年12月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1934年12月（57歲）至1938年11月任該校總長，1936年11月28日（59歲）入選為帝國學士院（今日本學士院前身，於戰後改名）會員（院士）。1941年4月日本癌學會創立，他擔任第一屆會長，1941年8月16日因病去世，享年64歲，並捐贈遺體做病理解剖。²⁶ 長與又郎過世後，追悼他的文章曾刊載於 *Science* 期刊。²⁷ 日本癌學會為紀念他，1996年設立「長與又郎賞」與獎金100萬日圓，每年頒發給一名對癌症研究或臨床或社會有貢獻者。²⁸

在學術成就方面，長與又郎是繼三浦守治與山極勝三郎後，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的第三代主任，主要研究恙蟲病、肝臟病理與癌症。1912年第2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邀請他做專題演講，題目為「腳氣：病理解剖學方面」，1914年第4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再次邀請他做專題演講，題目為「肝硬變：病理解剖學方面」。在日本的學術傳統上，被邀請在醫學會大會做專題演講，是對該學者在專業領域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因此學者無不兢兢業業長期準備演講內容；長與又郎是少數幾位曾於日本病理學會總會擔任過2次專題演講報告者。²⁹ 1930年4月，他在第8回日本醫學會，發表命名恙蟲病病原「東方型立克次體」；³⁰ 他同時也是日本帝國學士院會員、德國自然科學學士院院士，與巴西醫學士院院士。³¹

著作方面，除了專業學術期刊論文、研討會摘要、論著外，主要編輯父親長與專齋及師長三浦守治文集，包括《松香私志 完》、《松香遺稿》、《三浦守治論

年》中記載葉曙的老師馬杉復三是 Aschoff 的弟子，馬杉復三承襲 Aschoff 的研究精神與習慣，同樣的身教也影響了葉曙的研究態度與習慣。參見葉曙，《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 50-51。

²⁶ 〈長與又郎年譜〉，收於長與博士紀念會編，《長與又郎傳》（東京：該會，1944），頁 345-357。

²⁷ Waro Nakahara, "MATARO NAGAYO," *Science* 94: 2447 (Nov. 21, 1941), pp. 479-480.

²⁸ 〈日本癌学会 長與又郎賞（長與賞）〉，「日本癌学会」，下載日期：2013年11月3日，網址：<http://www.jca.gr.jp/researcher/award/nagayo.html>。

²⁹ 中央研究院院士葉曙教授《病理卅三年》中，有關於他的老師日本千葉醫科大學馬杉復三教授，接獲專題演講邀請後，花費一年的時間準備演講內容的生動敘述。參見葉曙，《病理卅三年》，頁 41-47。

³⁰ 長與博士紀念會編，《長與又郎傳》，頁 345-357。

³¹ 長與博士紀念會編，《長與又郎傳》，頁 353-356。

文全集》、《三浦守治先生歌集：移岳集》等。³² 日本畫家安井曾太郎曾為長與又郎繪「長與又郎博士肖像」、「長與博士顏素描」、「長與博士肖像素描」等。³³

他足跡遍布日本、德國、印度、美國、中國、瑞士、法國、丹麥、英國、滿洲、蒙古等地。³⁴ 30-32歲留學德國；1921年7月，以日本代表身分出席於印度加爾各答舉行的第4回極東熱帶病醫學會；1923年2-5月，應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邀請，與其他5位日本學者考察北美醫學教育；1925年3-4月，前往青島、濟南、北京、奉天等地；1928年3-8月，前往歐洲出席由國際聯盟在日內瓦主辦的衛生會議與血清標準會議、在巴黎舉辦的癩預防會議、於哥本哈根舉行的梅毒血清診斷法協議會，與在英國倫敦舉辦的萬國癌研究會議。³⁵ 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前往上海參加「支那衛生狀態協議」；1940年8-9月，以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的身分出席北京會議，並前往滿洲、蒙古、新疆等地。³⁶

長與又郎的社會角色多樣，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病理講座教授、醫學部長、總長，以及日本病理學會會長、癌研究會理事長與會長、³⁷ 傳染病研究所所長、³⁸ 日本癌學會會長、帝國學士院會員、極東熱帶病醫學會日本代表、洛克菲勒基金會醫學教育視察專家、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日本出席代表、德國自然科學學士院院士、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帝國教育會名譽會員、財團法人結核研究所所長、財團法人肢體不自由者療護團會長、日本醫學會會長、男爵等。³⁹

³² 長與專齋著、長與又郎編，《松香私志 完》（東京：長與又郎，1930）；長與專齋著、長與又郎編，《松香遺稿》（東京：長與又郎，1934）；三浦守治著、長與又郎編，《三浦守治論文全集》（東京：日本病理學會，1918）；三浦守治著、長與又郎編，《三浦守治先生歌集：移岳集》（東京：東大病院五十周年記念會，1937）。

³³ 安井曾太郎，《安井曾太郎肖像畫集》（東京：造形藝術社，1942）。

³⁴ 長與博士記念會編，《長與又郎傳》，頁348-357。

³⁵ 佐藤清，〈一九二八年獨乙國に於ける長與先生の思ひ出〉，收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五十周年記念會編，《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五十年史（下卷）》（東京：該會，1939），頁396-400。

³⁶ 長與博士記念會編，《長與又郎傳》，頁348-357。

³⁷ 有關長與又郎與癌研究會，請參閱 Kunio Aoki, "Contributions to Cancer Preven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2. The Dawn of Cancer Control Activities: Comparison of Japan and the USA,"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2: 1 (2001), pp. 15-26; Kunio Aoki, "Early History of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in Japan,"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7: 2 (2006), pp. 170-176.

³⁸ 有關長與又郎與傳染病研究所，請參閱 Waro Nakahara, "A Pilgrim's Progress in Cancer Research, 1918 to 1974: Autobiographical Essay," *Cancer Research* 34 (Aug. 1974), pp. 1767-1774.

³⁹ 佐藤清，〈一九二八年獨乙國に於ける長與先生の思ひ出〉，頁345-357。

東京帝國大學總長任內，長與又郎曾 2 次婉拒出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第一次是 1936 年 3 月廣田弘毅內閣時，第二次為 1937 年林銑十郎內閣時。⁴⁰ 此外，於總長任期內，曾發生矢內原忠雄辭退事件與荒木文相事件等。⁴¹

關於對長與又郎的評論，2012 年出版的《長与又郎：日本近代医学の推進者》，認為他是日本近代醫學的推動者。日本學士院院士內村祐之曾於 1967 年發表文章，「我認為是本國醫學界最卓越的人物之一（おが国の医学界が生んだ最も卓越した人物の 1 人であつたと思うので、（略）」，⁴² 文中敘述長與又郎是日本醫學界最卓越人士之一。

（二）〈長與又郎日記〉概要

長與又郎從 1892 年 1 月 1 日元旦（15 歲）開始書寫日記，⁴³ 目前保存下來的日記為 1893 年 8 月 17 日至 1941 年 8 月 15 日（從他 16 歲至過世前一天，約 48 年），其中 1894 年 8 月 14 日開始的半個月，因妹妹意外死亡而傷心的緣故，中斷寫作半個月；1896 年 9 月 4 日之前的日記以毛筆撰寫，並用和式裝訂為 3 冊，之後則是西式筆記本型式，平均一年為 2-3 冊，日記原本由家族成員、長與又郎的三男長與健夫及女婿清水文彥保存，其中清水文彥主要保管大正後半期與昭和時期的日記。⁴⁴

1944 年長與博士記念會編《長與又郎傳》一書於東京出版，書中內容參考日記手稿，並曾分散引用原文。⁴⁵

「東京大學史史料室」編輯歷屆總長年譜，收藏、整理東京大學相關史料，日記、照片、書簡，並編輯出版等業務，其刊行的《東京大学史紀要》，於 1983 年 7 月至 1992 年 3 月的九年期間，經清水文彥同意，陸續刊載其保存的〈長與

⁴⁰ 小高健，《長与又郎：日本近代医学の推進者》，頁 214-215。

⁴¹ 矢內原忠雄辭退事件本文將於後文敘及。1938 年 7 月期間，文部大臣（教育部長）荒木貞夫提議要求大學總長官制，直接由官方派任帝國大學總長，取消現行由教授選舉產生的方式，侵犯了大學自治的精神，最後事件的演變結果為荒木貞夫撤回提案，長與又郎辭去東京帝國大學總長職務。

⁴² 內村祐之，〈わが歩みし精神医学の道（11）：3 人の人物 長与又郎・清野謙次・大川周明〉，《精神医学》9:5（1967 年 5 月），頁 376。內村祐之是內村鑑三的長子，曾任東京大學精神醫學教室主任教授。

⁴³ 〈長與又郎年譜〉，頁 346。

⁴⁴ 照沼康孝、中野実，〈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東京大学史紀要》4（1983 年 7 月），頁 28-29。

⁴⁵ 長與博士記念會編，《長與又郎傳》，頁 47-49。

又郎日記)。⁴⁶

《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下)》2冊於2001-2002年由東京学会出版センター出版、小高健編輯註解。⁴⁷該書以長與又郎各階段的人生經歷分類日記章節，例如上冊為22章，分別為幼年、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時期、病理學教室時期、教授時期、傳染病研究所時期，與醫學部長時期等；下冊為20章，從總長時期至1941年逝世前，上、下冊分別為640頁與664頁。⁴⁸

〈長與又郎日記〉以其本人為主體，每日記載他當時一天的活動、經歷、事件、周遭人物、家人、與看法等，隨當日情況而每天內容或長或短，上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細節，從天氣、地點、醫療、閱讀內容等，都加以記錄；在他擔任所長、醫學部長、大學總長等公職期間，日記常有篇幅較長的記載內容，將日記當作備忘錄使用。這部日記是見證長與又郎一生重要的一手史料，雖然他是日本人，但其日記內容包含大量公領域的議題，並記載關於臺灣與中國近代史的相關史料，也由於他多樣的社會角色，能夠發掘並提供我們多面向的第一手史料，如醫療、教育、政治、社會、殖民、文化、生活史等方面。

三、〈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舉例

本節中，筆者將主要運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下2冊與《東京大学史紀要》期刊內容中，記載有關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

⁴⁶ 照沼康孝、中野実，〈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頁27-64；照沼康孝、中野実、前田一男，〈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月〉，《東京大学史紀要》5(1986年2月)，頁39-86；照沼康孝、中野実，〈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六月〉，《東京大学史紀要》6(1987年3月)，頁32-51；照沼康孝、中野実，〈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七月〉，《東京大学史紀要》7(1989年3月)，頁93-108；照沼康孝、中野実，〈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八月〉，《東京大学史紀要》8(1990年3月)，頁119-140；中野実、照沼康孝，〈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九月〉，《東京大学史紀要》9(1991年3月)，頁49-59；中野実、照沼康孝、清水康幸，〈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十月〉，《東京大学史紀要》10(1992年3月)，頁47-70。

⁴⁷ 小高健(1929-2011)為東京大學醫學博士暨教授，曾任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與醫科學研究所所長。

⁴⁸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下)》(東京：学会出版センター，2001-2002)；瀧澤利行，〈書籍紹介 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日本医史学雑誌》49:2(2003年6月)，頁387-389。

日記資料，說明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長與又郎扮演的角色與相關的人事決定等，其次為日記中有關矢內原忠雄辭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事件的記載，最後則是有關劉瑞恆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技術合作的史料。以此三個條目事例，由當時人記載當時事的日記優點，闡述〈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

（一）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的人事始末

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於 1928 年，幣原坦是首任總長，1936 年增設醫學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亦於同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為附屬醫學專門部。臺北帝國大學以日本本土制度為師，採取講座教授制度，每一講座 1 名教授，其主持下有助教授、助手和雇員等成員，每講座並獨立運作經費預算。山口秀高與高木友枝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首任與第二任校長，堀內次雄從 1915 年起至 1936 年 3 月歷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任校長、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與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任職校長長達 21 年。三田定則 1936-1937 年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1937 年 9 月至 1941 年 4 月為臺北帝國大學第二任總長。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之初，醫學部部長人選的產生過程，長與又郎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段經歷，其時任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⁴⁹ 1934 年 4 月 3 日日記記載如下：

〔昭和九年四月三日〕 星期一 神武天皇祭

十一點，臺北帝大總長幣原坦依照約定前來。因為後年昭和十一年將要開設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我接受他委託，幫忙推薦評選其醫學部部長的適任人選。不考慮將堀內氏升格，期望新人選為具備相當年齡、實力及品格的人才，同時答應最慢七天之內會與他說明我深思熟慮之後的考量與意見。

〔昭和九年四月三日〕 月 神武天皇祭

十一時、約により台北帝大総長幣原 坦氏来る。明後十一年同帝国大学医学部開設に付、その学部(長)となるべき適任者の選考の依頼を受く。堀口〔按：内〕氏を昇格することは断念しており、新たに相当年輩の實力

⁴⁹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 548-550。

ある人格者を希望しおれり。来る七日迄熟考し一応意見を開陳することを約す。⁵⁰

依據日記，1934年4月3日11點，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到長與又郎家中，商榷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候選人選，首先排除時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校長的堀內次雄，因為他們期望候選人選是新人、具有相當年紀與實力的「人格者」。日記中堀口氏為誤植，應是堀內次雄。長與又郎與幣原坦達成上述人選條件共識後，約定彼此深思熟慮後，最遲七日之內再作討論。

4月7日日記云：

〔昭和九年四月七日〕星期六 晴天

休息。

十點，幣原坦（臺北總長）依照約定前來家裡。關於臺北帝大醫學部長的人選，我們彼此做了第三次的意見交換。第一候選人為三田定則教授（法醫學），第二候選人為北海道帝國大學今裕博士。我提及三田氏雖然並非無可能性，但因為他還需要幾天時間深思（與岳父等商議），也告訴他兩人之中至少有一位可能會接受這個職位。

〔昭和九年四月七日〕土 晴

休養。

十時、約により幣原坦（台北總長）氏来邸。台北帝大医学部長人選に付、第三回の意見を交換す。第一候補三田（定則 法医学）教授、第二候補（北大）今（祐〔按：裕〕）博士とし、三田氏絶望に非ざるも数日間熟考の時を与らること必要（岳父等と相談）を述べ、両氏の内一人には少なくとも決定の望ある旨を告ぐ。⁵¹

1934年4月7日10點，幣原坦在長與又郎自宅中，商議醫學部部長候選人選，經過第三次意見交換後，最後產生2位候選人，第一候補三田定則、第二候補今

⁵⁰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49。

⁵¹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49。

博士。⁵² 今博士應為今裕，今（祐）應為誤植，例如《今博士還曆記念誌》是祝賀今裕 60 歲的文集。⁵³ 今裕曾於 1904-1909 年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任教，1904 年 9 月 7 日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教授病理學與解剖學，1906-1908 年臺灣總督府官費留學德國，1908 年 12 月 24 日晉升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1909 年 9 月 1 日轉任東京慈惠會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授，任教期間為 1909-1920 年，之後轉任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第一代教授。⁵⁴ 他在東京時期，結識長與又郎；當時東京地區的病理學教室，除了東京帝國大學之外，僅有陸軍、海軍軍醫學校、慈惠醫專、日本醫專，與東京女子醫專等，也沒有專門的病理學會或病理期刊，長與又郎和今裕、及上述機構的病理學師資，就定期聚會，舉辦抄讀會與研究報告會等。日本病理學會成立於 1911 年並在東京召開第一回總會，今裕擔任《日本病理學會會誌》編集幹事（期刊主編）一職，長與又郎則為會計幹事，學會總部就設立於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日本病理學會草創初期，今裕與長與又郎同甘共苦，相識、相交更深厚。⁵⁵ 由於長與又郎和今裕熟識，今裕時年（1934）56 歲，與臺灣有過淵源，此外他曾擔任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長，並將於 1934 年 5 月 11 日獲頒帝國學士院賞，符合「期望該人選為具備相當年齡、實力及品格的人才」條件。

4 月 11 日記下：

〔昭和九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陰天

十點，到學士會館拜訪臺灣總長幣原，並對先生報告三田博士已經答應擔任帝大醫學部長之事宜。先生顯得非常高興。

〔昭和九年四月十一日〕 水 曇

十時、学士会館に幣原台湾総長を訪問、三田博士受諾の旨を報告す。氏は非常に悦ばれたり。⁵⁶

⁵² 「第一候補三田（定則 法醫學）教授、第二候補（北大）今（祐）博士」，北大指北海道帝國大學，因 1937 年今裕時任北海道帝國大學總長，之前曾任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長。

⁵³ 武田勝男編，《今博士還曆記念誌》（札幌：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1939）。

⁵⁴ 武田勝男編，《今博士還曆記念誌》，頁 51-53；容世明，〈今裕：日治時期曾在臺灣服務過的病理醫師中，第一位獲得帝國學士院賞與擔任北海道帝國大學校長〉，《臺灣病理學會會誌》4: 1（2013 年 5 月），頁 75-79。

⁵⁵ 長與又郎，〈交友三十年〉，收於武田勝男編，《今博士還曆記念誌》，頁 30-33。

⁵⁶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 550。

1934年4月11日10點，長與又郎到學士會館拜會幣原坦，告知幣原坦，三田定則（時年59歲）已應允出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

1934年4月13日云：

〔昭和九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雨

（略）

五點半到學士會館探訪幣原總長，並遞交三田先生的履歷兩封。先生顯得非常高興。如此，關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推薦候選人之事宜，我的任務就至此告一段落。

〔昭和九年四月十三日〕 金 雨

（略）

五時半 學士會館に幣原總長を訪い、三田氏の履曆二通を交付す。氏は非常に悦ばれたり。之にて台北帝国大学の医学部長候補推薦に関する余の任務は一段落を告げたり。⁵⁷

1934年4月13日17點半，長與又郎再次到學士會館拜訪幣原坦，並交付2份三田定則的履歷資料，長與又郎自訴推薦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的任務已告一段落。

1934年7月11日記：

〔昭和九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下午三點 在前往癌研之前，三田定則君前來我的研究室，與我討論、商議關於臺灣醫學部教授的人選。病理決定為和氣，藥理則由京大某，解剖多分一名給京都，細菌由（傳研）黑屋政彥負責，也同時比較了矢追秀武和黑屋政彥兩人。醫院院長由大概（交涉中）擔任，內科一名是小田，外科一名為澤本等，我們一致認為這是最適切的安排。

〔昭和九年七月十一日〕 水

午後三時 癌研に赴くに先（立）ち、三田定則君來室。台湾医学部の教授詮衡を協議す。病理は和氣（決定）。藥理は京大某。解剖は多分京都。

⁵⁷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50。

細菌は（傳研）黒屋、矢追の内 黒屋の方を推す。病院長は大概（交渉中）、内科一名は小田、外科一名は澤本など宜しかるべしとの意見に一致す。⁵⁸

1934年7月11日15點，三田定則到癌症研究所，與長與又郎討論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人選，和氣即和氣巖，是最早被內定的病理學講座教授人選。⁵⁹至於藥理學講座教授人選，一開始的規劃並不是杜聰明博士，而是京都帝國大學某人選，解剖學講座教授人選則除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森於菟，尚多規劃1個名額給京都帝國大學，後來是該校的金關丈夫成為第二解剖學講座教授，內科小田則是小田俊郎，外科澤本應是澤田平十郎。

由於解剖學講座教授增加1名容額，後來對學術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依據劉莉娜的研究，金關丈夫在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之發展，扮演重要角色。⁶⁰

〈長與又郎日記〉1934年9月7日寫道：

〔昭和九年九月七日〕 星期五

十點 三田君前來。懇請我務必要推薦細谷君為臺灣教授，即使是兼任也無所謂。

〔昭和九年九月七日〕 金

十時 三田君來。細谷君を台湾教授にすることは兼任にてもよろし、是非之を勧誘せられたしと懇請せろる。⁶¹

9月10日云：

〔昭和九年九月十日〕 星期一 曇

三田君前來。感謝我將細谷君的事情安排妥當。

⁵⁸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54。

⁵⁹ 和氣巖（1897-1945），1923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醫學科，同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擔任助手，之後並升任講師；1926年任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東邦大學前身）病理學教授；1933年任平壤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授。1934年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主論文為流行性腦炎的病理。

⁶⁰ 劉麗娜，〈臺灣科學的一種開始及其歷史轉折：以體質人類學及蛇毒研究之發展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⁶¹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04。

〔昭和九年九月十日〕 月 曇

三田君来る。細谷決定に付ての礼訪なり⁶²

細谷是細谷省吾，他同意出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細菌學講座教授。長與又郎將其傳染病研究所的人事安排擴展到臺灣；同一時期滿洲國新京（今中國長春市）也將新設傳染病研究所，長與又郎也安排阿部俊男擔任所長一職。⁶³

1941年5月23日條記載：

〔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略）

早上，前幾天辭掉臺北帝大總長職務的三田定則博士前來拜訪。聽他提及因為已經完成了當初總長任內所規劃的諸多案件，並想要為後進之人開路的心態退休。這成人之美的態度實在讓我激賞。

〔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金 晴

（略）

朝、先般台北帝大總長の職を辞したる三田定則博士来る。総長就任の当時より計画せる諸案件完了したれば、後進に道を開く意味にて引退せる由なり。流石に美しきなり、その態度を賞揚す。⁶⁴

1941年5月23日上午，三田定則拜訪長與又郎，此時三田已66歲、並辭去了臺北帝國大學總長一職。長與又郎讚許三田定則當初就任總長時的規畫與計畫都已完成，因此主動退休把職位讓給後進，精神值得感佩。〈三田定則先生小傳〉記載三田定則於臺北帝國大學總長任內，充實醫學部、創設工學部、改革法文科、設置大學預科、設立熱帶醫學研究所、與振興臺北帝大學風等。⁶⁵

從長與又郎的日記來看，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特別是長與又郎，主導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時的人事規劃。今裕在離開臺灣近30年後，則是曾被考慮

⁶²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04。

⁶³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05。

⁶⁴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下）》，頁138。

⁶⁵ 〈三田定則先生小傳〉，收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教室五十三年史編纂會編，《東京帝國大學法醫學教室五十三年史》（東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教室，1943），頁179。

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的最終候選人之一。三田定則的學術專長為法醫學，今裕則為病理學，三田定則與今裕後來分別成為臺北帝國大學及北海道帝國大學總長，可見當時的規劃，醫學部長候選人都具備擔任總長的潛力。⁶⁶ 此外，三田定則與今裕也分別在 1942 年 2 月與 5 月，當選帝國學士院會員，⁶⁷ 從事後觀察，兩者均具備「具備相當年齡、實力及品格的人才」條件。今裕 48 歲時就任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長，長與又郎 56 歲時為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三田定則是 61 歲時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擔任總長的年紀，今裕是 59 歲，長與又郎為 57 歲，三田定則是 62 歲。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人選中，和氣巖是最早被定案者，一方面由於他也是出身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和長與又郎是師生關係，和氣巖並於 1934 年以流行性腦炎的病理為主論文，取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另一方面，他在上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之前，會由臺灣總督府先任命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再由總督府官費派任為在外研究員出國進修。

〈長與又郎日記〉1929 年 9 月 27 日日記云：

〔昭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略)(醫學部病理學教室)(略)

要讓和氣巖氏當講師。

〔昭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金

(略)(医学部病理学教室)(略)

和氣巖氏を講師にすること。⁶⁸

1929 年 9 月 27 日，和氣巖由助手晉升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講師的過程，長與又郎將之寫入日記，表示他對和氣巖的器重。

1934 年 10 月 4 日寫道：

⁶⁶ 1945 年以前，日本的帝國大學總長為病理學出身者有長與又郎、今裕等，這項傳統也沿續到今日，例如東京大學戰後有森亘等病理學出身者擔任總長。

⁶⁷ 〈物故會員一覽(50音順)力行〉，「日本学士院」，下載日期：2013 年 11 月 2 日，網址：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bukko/k_gyo.html；〈物故會員一覽(50音順)マ行〉，「日本学士院」，下載日期：2013 年 11 月 2 日，網址：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bu-kko/m_gyo.html。

⁶⁸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 478。

〔昭和九年十月四日〕 星期六 晴

這一夜，與近期將要赴任滿洲帝國衛生技術廳長的阿部俊男，以及今夜即將出發前往歐洲的和氣巖，招待兩位在自宅共進晚餐，對於赴任之後的應注意事項等，給了他們很多意見，並贈送照片、墨寶、以及遺稿《松香私志》等作為餞別的禮物。

〔昭和九年十月四日〕 土 晴

この夜、近く滿洲帝國衛生技術廳長として赴任の阿部俊男、今夜出發渡歐する和氣巖の兩氏を自宅に招待晚餐を共にし、種々赴任後の事に付き注意を与え、写真、揮毫、遺稿『松香私志』等を餞別としてする。⁶⁹

1934年10月4日，長與又郎在自家晚宴款待阿部俊男與和氣巖，因為阿部將前往滿洲國任衛生技術廳長，而和氣巖則將於當晚出國進修，長與又郎與兩位合照、揮毫、並致贈他們父親長與專齋遺稿《松香私志》。這也提供了一條關於長與又郎與和氣巖師生情誼的史料。和氣巖後留學德國進修神經病理學，跟隨慕尼黑 Walther Spielmeyer 教授與 Willibald Scholz 教授學習。⁷⁰

長與又郎在日記中提及，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的人選條件為「期望該人選為新人、具備相當年齡、實力及品格的人才」。並未記載幣原坦曾向他提出「南進」發展、或熱帶醫學研究、或配合殖民政策為醫學部長人選條件的重點考量。如果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一開始就被設定為發展熱帶醫學研究，長與又郎曾任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他將是理想的諮詢對象，應該推薦該領域專家學者，但最後的2位考慮人選，一是法醫學教授，另一名則是病理學教授。即使在確定為三田定則後，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人選中，和氣巖是最早被定案的人選，但他也並非熱帶醫學專家。所安夫著〈輓近20余年間の日本における病理学の発展と動向〉（最近二十年來日本病理學的發展與動向）一文，推崇和氣巖與內村祐之等

⁶⁹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05。

⁷⁰ Walther Spielmeyer 教授（1879-1935）是慕尼黑 Deutsche Forschungsanstalt für Psychiatries, Kaiser-Wilhelm Institute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iatry 前身) 的神經病理部門主任；前任者為有名的 Alzheimer (Alzheimer's disease [失智症] 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Spielmeyer 是神經病理組織學方面德國學派的領導人，其研究領域主要為中樞神經系統的循環疾病與傳染性腦炎等。他的實驗室不斷有世界各地的學者前來進修。Willibald Scholz 教授（1889-1971）與 Spielmeyer 隸屬同一機構，主要研究 Vögt 病 (Status marmoratus) 的病理機轉。

為日本腦神經病理創設者。⁷¹ 和氣巖來臺後的研究，也是以神經病理研究為最終學術依歸。有關熱帶醫學研究，即使是細菌學人選細谷省吾，也是在和氣巖定案 2 個月後才邀請確定。1934 年 7 月 11 日，三田定則與長與又郎討論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人選，熱帶醫學專家小田俊郎是當天病理、解剖、藥理、細菌、內科、外科等講座與醫院院長的七名討論人選之一。小田入選，不僅因為他的學術專長，也可能因為他是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校長堀內次雄的女婿。從〈長與又郎日記〉中的觀點觀察，有關殖民母國人才移轉至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他一開始的人選設定，並非依據殖民地熱帶醫學發展或南進殖民需要為主要考量；關於殖民地熱帶醫學發展或南進殖民需要等關鍵政策的制定，是否單純以私人日記的觀點，就能窺其全貌，尚需進一步研究。此外，有關殖民地臺灣熱帶醫學的發展，也牽涉到殖民母國學者來臺後，因為與母國研究場域或地點的差異，進而產生研究題材是否不同等問題。⁷²

有關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由日本母國來到臺灣後研究場域與方向的差異，再度以〈長與又郎日記〉中所述最早被決定的人士、和氣巖為例，他自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其研究場域與地點包括東京、朝鮮平壤、與臺灣臺北，歷經兩個日本殖民地，可以作為比對觀察的對象之一。和氣巖 1931-1934 年任職於朝鮮平安道立平壤醫學講習所、朝鮮公立專門學校教授、平壤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教授病理學。他在朝鮮期間的研究，主要利用動物實驗，以 3-Astyl, Novocain, Tutocain, 與 Akoin 等藥物，製造實驗動物肢體過動或低張 (hyperkinetic-hypotonic) 的現象，以模擬中樞神經系統如巴金森氏症的表現，進而觀察神經系統的組織病理變化，並特別針對神經元與膠質細胞的影響，以及中樞神經系統各部位與路徑觀察的探討；研究題材主要為神經病理的專業學術領域。⁷³

⁷¹ 所安夫，〈較近 20 余年間の日本における病理学の發展と動向〉，收於日新医学協會編，《日本医学の發達》（東京：日新医学本社，1955），頁 112。

⁷² 感謝匿名審查專家的寶貴意見，本段行文主要依據其洞見與提點修改論述。

⁷³ 和氣巖，〈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一報告）：家兔に於ける實驗的 3-アスチール，ナボカイン及びアコニン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1（1931 年），頁 622-632；和氣巖，〈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二報告）：家兔に於ける實驗的シトカイン及びホロカイン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2（1932 年），頁 853-856；和氣巖，〈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三報告）：家兔に於けるアスチール及び爾他無菌靜毒の併用試験〉，《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3（1933 年），頁 920-923；和氣巖，〈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四報告）：猿に於ける實驗的 3-Astyl 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4（1934 年），頁 348-351。

和氣巖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時期，也延續腦神經病理的研究主題，於《臺灣醫學會雜誌》與《日本病理學會會誌》發表多篇有關神經病理的論文，研究題目包括中樞神經外傷、腦血管疾病、腦出血、感染、炎症、腦瘤、與退化性疾病等。⁷⁴ 在研究方法上，他也改良創新特殊毛細血管表現法，應用在探討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之血管變化。⁷⁵ 1942年於東京舉行的第32回日本病理學會總會，和氣巖被邀請做專題演講，這是他的研究回顧，題目為「中樞神經系統疾病選擇性損傷之病理機轉（腦脊髓內選扞性限局巢の發生機序）」，並以德文發表長達106頁的論文，⁷⁶ 文中主要探討各種疾病，例如腦出血、腦梗塞、血栓栓塞、血管炎、炎症、腦腫瘤、髓鞘疾病、癲癇、退化、與中毒等，造成中樞神經系統選擇性損傷的病理變化，並探討其致病機轉。⁷⁷

上述有關神經病理的研究，需要經費作為研究的後盾，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初期的年度經費約為1萬7,000日圓；臺北醫專病理學教室的年度經費約為2,400日圓。⁷⁸ 比較同時期日本本土與朝鮮等地病理學教室的年度經費，例如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約為6,500日圓，岡山醫科大學病理學教室為8,654日圓，千葉醫科大學病理學教室為7,000日圓，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室為3,500日圓，京城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室為2,665日圓，Severans 聯合

⁷⁴ 例如血行障礙中樞神經組織內病變、腦膜腦炎血行障礙中樞神經組織內病變、Vogt病、瘧疾的中樞神經病理、腦腫瘍病理組織學的研究、流行性腦炎病理中樞神經組織內炎性變化、血行障礙大腦及小腦內限局性病變、脊髓傷害、麻痺狂、多發性點狀腦出血、小腦髓母細胞瘤(Medulloblastoma)、Wernicke氏假性腦炎、假性球麻痺、血栓性多發性大腦皮質軟化等，多篇論文與病例報告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與《日本病理學會會誌》，並收錄於《剖檢示說》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業績集》。參見和氣巖，《剖檢示說(第一卷)》(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1939)；可知直三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業績集(第一、二卷)》(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1939)。

⁷⁵ 和氣巖、松隈數馬，〈二三の腦膜腦炎に於ける血行障礙ニ基く中樞神經組織內病變ニ就イテ〉，《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8(1938年)，頁391-398。

⁷⁶ Iwao Wake, "Über pathogenetische Fragen der örtlichen elektiven Vulnerabilität im Zentralnervensystem," *Transacciones Societatis Pathologicae Japonicae* (《日本病理學會會誌》) 32(1942年), pp. 577-682.

⁷⁷ 有關中樞神經系統選擇性損傷(selective vulnerability)致病機轉的探討，是和氣巖在當代的學術前沿，當時對於致病機轉有兩個學派主張，一派是以Spielmeyer為首，主張血管循環的問題為主要致病機轉，另一派以Vogt為首，主張細胞毒性才是主要致病機轉。和氣巖試圖解答、回應此議題，他的研究佐證Spielmeyer學說。但近年來隨著分子醫學的進步，發現細胞接受體也扮演重要角色，細胞毒性學說再度被接受。

⁷⁸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五十周年記念會編，《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五十年史(上卷)》(東京：該會，1939)，頁360、379。

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教室為 5,768 日圓等，可以發現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在早期是經費充裕的學科。⁷⁹ 講座制度是日本戰前大學的主要教育研究單位，編制為 1 名講座教授，下設助教授、講師、助手、副手、技術人員、與行政人員等，講座制要求教授專攻於某項學術專業領域，並在其學科教室擁有極大的權力。和氣巖在這種講座制度與充裕的經費支撐下，從事其神經病理的專業學術研究。

和氣巖來臺約 9 年後，於 1945 年 5 月 20 日病逝，年僅 49 歲。遺體由薄田七郎病理解剖，技術員高銘都製作標本切片，根據高銘都的回憶文章，和氣巖當時如果沒有逝世，預定在兩年後回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擔任教授。⁸⁰ 這個說法應有可信度，因為三田村篤志郎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第二講座教授期間為 1935-1947 年，與兩年後的說法時間吻合。和氣巖曾任日本病理學會 1943 年第 33 回總會副會長。長與又郎安排他來臺擔任病理學教授，除了擴展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的影響力，也可能意圖培養和氣巖日後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的接班成員。和氣巖與日本母國師長的淵源，也可能是他可以在臺灣從事其神經病理學術研究的原因之一。

內科教授小田俊郎與桂重鴻對結核病的研究為例。范燕秋曾詳細分析兩人對結核病的調查、研究、與治療，該文歸納小田俊郎的研究特點，分別為熱帶風土與結核病的關係、新的診斷技術、與臺灣結核流行的風土特色。⁸¹ 小田來臺任教前，是北海道帝國大學內科第一講座教授有馬英二的助教授。在札幌的有馬內科也收治許多結核病患，例如 1921-1931 年十年期間結核病患人數為 4 萬 9,392 人；比較臺北病院內科 1925-1934 年約十年期間結核病患人數，「內地人」為 4 萬 4,274 人，「本島人」為 2 萬 2,747 人。⁸² 以臺北病院內科而言，日本人結核病患的人數與札幌有馬內科接近，此外札幌位於日本的北端，臺灣則是南端，並沒有因為南北地點不同，結核病患人數有明顯差異。小田俊郎在有馬內科已有結核病的診斷、治療、與研究的學術訓練與臨床經驗。有馬英二著《肺結核の予後》一書，

⁷⁹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五十周年記念會編，《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五十年史(上卷)》，頁 351-399。

⁸⁰ 高銘都，〈漫談病理科 42 年 8 個月〉，收於國立臺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編，《臺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該所，1987)，頁 237-240。

⁸¹ 范燕秋，〈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頁 101-103。

⁸² 小田俊郎，〈臺灣二於ケル結核ノ地理病理學的觀察〉，《結核》16: 12 (1938 年 12 月)，頁 1456-1484。

總結其對結核病的臨床經驗與研究。⁸³ 該書內容章節包括討論結核病的分類、診斷、流行病學調查、研究、與治療等，架構與小田俊郎的研究論文架構高度重疊，也表示兩人的研究取向與方法有雷同相似之處。小田來臺後的研究題材，延續有馬內科對結核病的研究。

如果將結核病研究的視野，擴展到日本母國、朝鮮等地，顯示該方面的議題非南方醫學專利，日本本土對結核的研究也是方興未艾，不論從公共衛生、疾病機轉、治療、與預防等，都是當代熱門的研究課題。例如 1923 年日本結核病學會成立至今，創設的主要發起人為北里柴三郎。⁸⁴ 此外，以日本病理學會為例，其總會專題報告為結核病方面的題目亦不勝枚舉。⁸⁵

關於地方性甲狀腺腫的研究，范燕秋曾詳細分析外科教授澤田平十郎與河石九二夫對地方性甲狀腺腫的調查、研究、預防與治療，該文歸納「臺灣成為東亞其他地區預防治療地方性甲狀腺腫的實驗地」，其成果支援日本帝國殖民與擴張。⁸⁶ 河石九二夫來臺前是名古屋醫科大學齋藤真教授的外科醫局助教授，齋藤是日本腦神經外科的開拓者之一，河石則主要從事輸血與腹膜炎的研究。⁸⁷ 河石九二夫來臺後的一年半內，1939 年河石外科病患人數總數為 2 萬 6,979 人，其中甲狀腺腫病患人數達 1 萬 9,974 人，他發現地方性甲狀腺腫是臺灣的特殊現象，

⁸³ 有馬英二，《肺結核の予後》（東京：日本医書出版，1947）。

⁸⁴ 〈学会の概要と構成〉，「日本結核病学会」，下載日期：2014 年 3 月 1 日，網址：<http://www.kekkaku.gr.jp/about/index.html#syu>。

⁸⁵ 包括 1926 年佐多愛彦演講「結核病的嚴重感染（結核重感染に就て）」，1936 年竹内清演講「結核病變的組織發生機轉（結核病變の組織發生学）」，1939 年馬杉復三演講「過敏的病理學意義（アレルギーとその病理学的意義）」等。即使在戰後，1948 年仍有武田勝男演講「結核病與過敏（結核病變の成立とアレルギー）」、波多野輔久演講「感光色素對結核病的研究（感光性色素の結核に及ぼす影響）」、Dr. Knighat 演講「結核預防對策（結核予防対策）」，1954 年青木貞章演講「肺結核治癒機轉的病理學研究（肺結核の治癒機轉の病理学的研究）」等。此外，中央研究院院士葉曙 1934-1941 年在千葉醫科大學病理學教室馬杉復三教授的門下攻讀醫學博士學位，主要也是從事結核病與過敏相關的實驗研究。有關結核病的研究論文，《日本病理學會會誌》1936 年刊載 12 篇、1937 年 12 篇、1938 年 9 篇、1939 年 14 篇、與 1940 年 17 篇等。參見〈宿題報告一覽（1911-61 年分）〉，「日本病理学会」，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4 日，網址：<http://pathology.or.jp/jigyuu/lectures-1911-61.html>；葉曙，〈Über die allerische Gewebsreaktion der Lunge〉（日譯：肺臟のアレルギー：性組織反應に就て；中譯：肺部的過敏組織反應），《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5（1935 年），頁 183-194；日本病理学会編，《日本病理学会 50 年史（下卷）》（東京：南山堂，1966），頁 118-119。

⁸⁶ 范燕秋，〈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頁 107-108。

⁸⁷ 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會編，《河石九二夫》（広島：広島大学医学部第二外科同門会，1975），頁 155-156。

在臺第一年，就開始著手進行該疾病的研究調查，之後總調查人數達 31 萬 8,116 人。⁸⁸ 河石九二夫於 1941 年在 *Annals of Surgery* 期刊發表論文“Endemic Goiter in Japan (日本的地方性甲狀腺腫)”，總結其對地方性甲狀腺腫的研究經驗。該論文個案數方面，統計、比較日本本土 21 個醫療中心和 2 家甲狀腺專門醫院的個案數、與河石在臺灣收案數目的差異，日本本土一年甲狀腺腫病患數約 957 人，與河石外科的 1 萬 9,974 人相去甚多。⁸⁹ 河石九二夫來臺後，由於研究場域與題材的不同，地方性甲狀腺腫成為其研究的課題。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教室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近年來學者研究認為這是學術政治化，作為日本帝國南進的戰略。⁹⁰ 回顧金關丈夫的研究軌跡，他在 1929 年就曾發表論文〈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一)〉與〈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二、完)〉，該研究是以臺灣新竹州大溪郡角板山 20 名泰雅族原住民男性為樣本，捺印其手掌與腳掌，測量指紋的體質研究，捺印的工作由金關與京都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助手忽那將愛共同完成。⁹¹ 此外，金關丈夫對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認識，也可透過中野由己了解。中野由己是 1923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第二屆畢業生，之後前往京都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擔任副手，1925 年升任助手，在京都帝國大學期間與助教授金關丈夫共事，曾與金關共同研究、發表論文〈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報告 22 歲蘭嶼原住民男性全身骨格，金關丈夫與中野由己於 1928 年 8 月對此全身骨格做測量研究；⁹² 此外，中野也與金關合著《組織學實習圖譜》。⁹³ 金關丈夫來臺任教前，

⁸⁸ 橋本義雄，〈河石先生と私〉，收於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会編，《河石九二夫》，頁 156；河石九二夫，〈臺灣ニ於ケル地方病性甲狀腺腫ニ就イテ〉，《臺灣醫學會雜誌》39: 10 (1940 年 10 月 28 日)，頁 1667-1728。

⁸⁹ Kunio Kawaiishi and Yoshio Hashimoto, “Endemic Goiter in Japan,” *Annals of Surgery* 113: 4 (Apr. 1941), pp. 481-495.

⁹⁰ 范燕秋，〈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頁 108-110。

⁹¹ 金關丈夫，〈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一)〉，《人類學雜誌》44: 11 (1929 年 11 月)，頁 519-546；金關丈夫，〈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二、完)〉，《人類學雜誌》44: 12 (1929 年 12 月)，頁 573-601。

⁹² 金關丈夫、中野由己，〈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一)〉，《人類學雜誌》45: 3 (1930 年 3 月)，頁 95-117；金關丈夫、中野由己，〈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二)〉，《人類學雜誌》45: 5 (1930 年 5 月)，頁 183-200；金關丈夫、中野由己，〈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人類學雜誌》45: 6 (1930 年 6 月)，頁 220-241。

⁹³ 金關丈夫、中野由己、谷口善之，〈組織學實習圖譜(上卷)〉(東京：金原商店，1933)。

被聘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與在外研究員，由臺灣總督府贊助其歐洲留學，這也是吸引人才來臺的一個助因。⁹⁴ 1929年與1930年，金關就發表臺灣體質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助教授忽那將愛也是在1929年就來臺從事原住民手足皮膚紋理的實際測量調查研究，即使1936年後，他們的研究場域由日本轉移到臺灣，題材也仍延續對臺灣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他們在1929年與1930年對臺灣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當時應未以「貢獻於帝國南進為目標」。⁹⁵

葉碧娥有關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認為，臺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與學術調查係配合日本南進政策。⁹⁶ 但如本文上述研究所示，醫學部講座教授的研究場域與題材並不能以均一的現象解釋，此外，〈長與又郎日記〉所揭露的人事安排與醫學門閥關係等，探討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有關熱帶醫學及南方醫學發展等議題，尚有可擴展探討與再研究的空間。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與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轉換之際，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也曾請托於長與又郎，1933年9月25日日記寫道：

〔昭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

(略)

佐藤三吉先生前來。提及了在臺灣設立帝大醫學部的預算案，終於可在下次的議會會期提出，而且住在臺北的本名博士亦表示希望可以在東大考慮的教授人選時盡一份力。我允諾他我將會考慮此事。

〔昭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月 晴

(略)

佐藤三吉先生来る。台湾に愈帝大医学部設立の予算、来る議会に提出せらるるに付、台北在住の本名博士よりこの際東大の教授人選に尽力せんことを希望し來たる由を語る。考慮すべしと約す。⁹⁷

⁹⁴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與在外研究員，除了金關丈夫，尚有細菌學講座的武田德晴、病理學講座的和氣巖、外科學講座的澤田平十郎等。

⁹⁵ 「貢獻於帝國南進為目標」語出自范燕秋，〈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頁108。

⁹⁶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

⁹⁷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527。

1933年9月25日日記云，日本國會議會將討論臺北帝國大學設立醫學部的預算案，佐藤三吉來拜訪長與又郎，提及臺北本名博士的請託之辭。「本名博士」為本名文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外科學教授。本名文任與臺北帝國大學外科第一講座教授澤田平十郎，都出身東京帝國大學第二外科佐藤三吉門下。雖然本名後來並不在臺北帝國大學外科講座教授的規劃人選名單，但他成功轉任朝鮮京城帝國大學外科講座教授。

日本選擇醫學學者來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任教，由長與又郎日記的內容，可以體會、觀察到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人事安排，與日本醫閥門派有關的面向。⁹⁸ 劉士永曾從社會結構演化的角度，探討日本西洋醫學的溯源與流變，由蘭醫學到國家醫學的形塑、醫界師承系譜、派閥文化脈絡、及現代醫者轉化等。⁹⁹ 書中提到的流轉與離鄉、名門與正宗等議題，提供反映、佐證、與深入探討本土資料的方向。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7 個講座、22 位教授中，至少有 6 位是日本高校時期或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同屆畢業生，他們就任講座教授時的年齡約為 43 歲左右，人數約為講座教授的四分之一。外科第二講座教授河石九二夫、生理學第二講座教授細谷雄二與內科第三講座教授澤田藤一郎，是就讀第一高等學校時的同學。河石九二夫與外科第一講座教授澤田平十郎、皮膚科教授高橋信吉、及內科教授柳金太郎，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 1921 年的畢業生。¹⁰⁰

其次，講座教授其父兄多為臺灣或日本等地的教授，例如內科第一講座教授小田俊郎，岳父為臺北醫專校長堀內次雄；¹⁰¹ 生理學第二講座教授細谷雄二，兄長細谷雄太曾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耳鼻喉科教授；生化學講座教授志賀直，為京城帝國大學總長志賀潔的長子；眼科助教授國友昇的父親，為長崎醫科大學解剖學教授國友鼎；細菌學教授細谷省吾的兄長中村豐，則是北海道帝國大學細菌學教授。¹⁰²

⁹⁸ 感謝匿名審查專家的寶貴意見與提點。

⁹⁹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¹⁰⁰ 河石九二夫，〈老外科医の思い出〉，收於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会編，《河石九二夫》，頁 23-24。

¹⁰¹ 小田滋著、洪有錫譯，《見證百年臺灣：堀內、小田兩家三代與臺灣的醫界、法界》（臺北：玉山社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¹⁰² 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大阪：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2009），頁 23-30。

第三，講座教授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多為師生情誼，例如生理學第一講座教授竹中繁雄，是永井潛任職東京帝國大學生理學教授時的弟子。¹⁰³

講座教授有同窗、世家、師門等的名門與正宗關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助教授的人事安排，也是觀察日本醫閥、門派、與世家面向的另一切入點。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講座教授來臺就任時，有關其助教授人選的安排，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如果該講座教授在日本本土的學術位階為助教授，其原本所在日本母國學科教室的主任教授，會將自己的女婿安排在將赴任臺灣的講座教授身邊，成為其助教授，以方便照顧女婿、女兒一家，並提攜女婿。因為該女婿在日本母國的學術位階，通常為岳父學科教室的助手，經由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頭銜的鍍金，加上由在臺講座教授指導其研究與論文發表，日後回到日本本土，就有機會更上一層樓，進而接任其岳父的重要學術地位。解剖學第一講座教授森於菟與助教授中山知雄，均出身東京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他們分別與東京帝國大學解剖學教授有親屬關係，例如森於菟的姑丈小金井良精是該校解剖學教授(任期 1886-1921 年)，中山知雄的岳父西成甫，則於 1936-1945 年擔任同校解剖學主任教授。中山於戰後回到日本，成為日本大學解剖學教授，1974-1985 年為防衛醫科大學教授兼副校長，¹⁰⁴ 並於 1972-1975 年擔任日本解剖學會第 23 屆理事長；他的岳父西成甫則曾於 1934-1935 年與 1942-1943 年擔任日本解剖學會理事長。¹⁰⁵ 外科第二講座教授河石九二夫的助教授為橋本義雄，河石來臺前是名古屋醫科大學外科第一講座教授齋藤真的助教授，橋本則是齋藤外科教室的醫局成員，也是齋藤真的女婿。¹⁰⁶ 橋本義雄戰後回到日本，也成為名古屋大學第一外科講座教授，隔代承襲其岳父的職位，並於 1964-1966 年擔任名古屋大學醫學部部長、與愛知醫科大學學長等。橋本於 1967 年第 67 回日本外科學會總會擔任會長一職，其岳父齋藤真則曾於 1936 年第 37 回日本外科學會總會擔任會長。¹⁰⁷

¹⁰³ 泉孝英編，《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東京：医学書院，2012)。

¹⁰⁴ 泉孝英編，《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頁 451。

¹⁰⁵ 泉孝英編，《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頁 459；日本解剖学会百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記念出版委員会百年史担当委員会編，《日本解剖学会百年のあゆみ》(東京：日本解剖学会，1995)，頁 312。

¹⁰⁶ 橋本義雄，〈河石先生と私〉，頁 155-156。

¹⁰⁷ 〈日本外科学会年表〉，「日本外科学会」，下載日期：2014 年 2 月 24 日，網址：http://www.jssoc.or.jp/intelligence/meeting/mtg_soukai.html。

第二種助教授的人事安排模式，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講座教授，從原本所在日本母國學科教室的醫局成員中挑選，這些例子主要為內科助教授，因為一方面熟諳此助教授的為人處事，另一方面無論在臨床內科照護病人、教學、行政、研究等方面，都能協助該講座教授。內科第一講座教授小田俊郎與其助教授石井潔來臺前，分別是北海道帝國大學內科第一講座教授有馬英二的助教授與醫局成員；內科第二講座教授桂重鴻與其助教授楠信男，則分別是東北帝國大學內科第一講座教授熊古岱藏的助教授與醫局成員；內科第三講座教授澤田藤一郎與其助教授佐藤八郎，分別為九州帝國大學內科第三講座教授小野寺直助的助教授與醫局成員。¹⁰⁸

第三種助教授的人事安排模式，則為講座教授原本所在日本母國學科教室的同門師兄弟關係。例如解剖學第二講座教授金關丈夫與助教授忽那將愛，均出身京都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¹⁰⁹ 病理學第一講座教授和氣巖與助教授薄田七郎，是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助手時期的同窗；病理學第二講座教授武藤幸治，也是出身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助教授中，有 4 位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 1931 年的畢業生，例如外科角井菊雄、眼科國友昇、小兒科村上勝美、與婦產科木村義明；病理學第二講座教授武藤幸治也是 1931 年畢業；內科助教授楠信男是同校 1932 年畢業生，中山知雄則是 1933 年畢業。¹¹⁰

此外，學科教室的設立也有其特別面貌，例如河石九二夫（時年 43 歲）1938 年 2 月來臺就任臺北帝國大學外科第二講座教授，並非單槍匹馬，而是組成一個團隊來臺，成員包括橋本義雄、齋藤外科醫局成員森直之（來臺為醫局長）、佐佐木賴與毛受英次（來臺任河石外科醫局成員），與名古屋大學畢業生李永樂和大屋祥一（來臺入河石外科）等十多名成員。¹¹¹ 此外，河石來臺前，就曾於 1937 年 7 月派橋本義雄（時年 33 歲）先來臺灣進行前置作業，包括設立新的手術室開刀房、增建設備、設置動物實驗室、診間區域與人事安置等。¹¹² 河石外科教室創設時，

¹⁰⁸ 泉孝英編，《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頁 153、174、178、223、295、301-302。

¹⁰⁹ 泉孝英編，《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頁 180、225。

¹¹⁰ 泉孝英，《外地的医学校》，頁 23-30。

¹¹¹ 毛受英次，〈追憶〉，收於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會編，《河石九二夫》，頁 205。

¹¹² 橋本義雄，〈河石先生と私〉，頁 155-156。

除了原本名古屋的成員，也吸引小林智仁夫、佐佐木重雄、富田正子等由臺北病院轉入，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生詹益恭、方錫玉、蔡國銘等加入。¹¹³ 之後也陸續吸引日本本土院校的臺籍畢業生加入河石外科，例如熊本大學畢業生林炎堃、日大醫專畢業生楊緒榮、與金澤大學畢業生許書劍等，日後上述成員還成立了河石外科同門會。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時的講座教授與助教授等人事安插，體現了日本本土醫閥門派世家的複雜關係與現象。在此基礎之上，對於臺灣醫療發展史的研究可以提供另一方面的視角。

（二）矢內原忠雄辭退事件

長與又郎於1934年12月被選為東京帝國大學總長，至1938年11月辭退，任內發生矢內原忠雄辭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事件，這也導致他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總長職務評價不高。¹¹⁴ 但此一觀點，隨著1983年長與又郎的日記揭諸於世後，學者又有修正的看法。¹¹⁵

矢內原忠雄與臺灣淵源深厚，所撰著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是研究臺灣殖民地的經典著作；¹¹⁶ 他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影響不少臺灣人士，例如陳茂源、葉榮鐘、郭維租等。¹¹⁷ 葉榮鐘著〈矢內原先生與我〉一文，¹¹⁸ 述說他的宗教觀

¹¹³ 毛受英次，〈追憶〉，頁205。

¹¹⁴ 家永三郎從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觀點，由矢內原忠雄辭退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的事件，認為當時身為該校總長的長與又郎，在軍國主義威權下，沒有捍衛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精神的風骨。參見家永三郎，〈大學自治の歴史的考察：大學管理制度と學問の自由との關係を中心に〉，《思想》459（1962年10月），頁99-116；家永三郎，《大學の自由の歴史》（東京：塙書房，1962），頁64-65。

¹¹⁵ 照沼康孝，〈東京帝大經濟学部問題と長与又郎：長与又郎日記を中心に〉，《東京大學史紀要》8（1990年3月），頁81-92。

¹¹⁶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29）。

¹¹⁷ 黃子寧，〈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1945）〉，收於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708-709；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の台湾》〉（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126-129；陳茂源，〈譯者跋〉，收於矢內原忠雄著、陳茂源譯，《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頁301；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收於葉榮鐘，《葉榮鐘全集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211-227；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109-121。矢內原忠雄的著作，陳茂源曾翻譯《帝國主義下の台湾》，郭維租曾翻譯《詩篇講義》、《啓示錄講義》、《我所尊敬的人物》、《約翰福音講義》等，介紹給臺灣的讀者。

¹¹⁸ 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頁211-227。

念完全是矢內原忠雄啟蒙與栽培，而兩人初次見面是在「昭和元年（1926年）四月」，¹¹⁹ 葉榮鐘時任林獻堂的秘書，奉他的命令到臺中車站接矢內原忠雄前往霧峰林宅並午宴。因為1927年3月18日至5月16日期間，矢內原忠雄來臺灣調查研究。此外他也與林獻堂友誼交往，葉榮鐘著〈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一文，¹²⁰ 記述矢內原忠雄與林獻堂的來往最早是1927年4月在霧峰林家，該文也翻譯矢內原忠雄於1957年1月所寫對林獻堂的追悼文〈花瓶の思い出〉（花瓶的回憶）。¹²¹ 《灌園先生日記》則記載了其他6次會晤，¹²² 地點都在東京。¹²³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矢內原忠雄於《中央公論》9月號發表〈國家の理想〉，藤井武七周年紀念演講會於同年10月1日在東京日比谷市政講堂舉行，矢內原忠雄演講題目為「神の国」，他結語：「日本啊！你要死，要先大死一番，然後才能

¹¹⁹ 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頁211。〔按：1926年應為1927年，回憶的誤植。〕

¹²⁰ 葉榮鐘，〈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收於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187-191。

¹²¹ 矢內原忠雄著〈花瓶の思い出〉一文追思林獻堂，文中提到1937年12月與戰後的兩次會面，其中1937年12月為矢內原忠雄辭退教職後，林獻堂贈送他一件深碧色玻璃花瓶，矢內原忠雄相當愛用此花瓶，並睹物思人。〈花瓶の思い出〉一文，葉榮鐘〈花瓶的回憶〉翻譯如下：「林獻堂先生，在受知臺灣人士之中，所獲印象，為品格最高潔之前輩，其修長如鶴之體軀與風采，所貽人以清高絕俗之感覺，永遠留在我之記憶。先生枉顧寒舍凡兩次，初次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恰值我對日本軍國主義發表反對的言論，致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之際，時先生攜贈一深碧色玻璃花瓶，專程蒞舍下慰問，一番美意，令人感激不忘。自是以來所贈花瓶成為我平素愛用之物，而每睹物思人，倍切感念先生為人之真誠與友情。先生再次過訪，係為戰後臺灣之將來問題，徵求鄙見，而先生虛懷坦誠，始終未提己見，專心傾聽本人之陳述。人之真誠與友情，實為超越國境，不分民族，彼此珍貴締交之鎖鍊，我得結識先生具有真誠、友誼、謙虛而且思慮深遠之士，誠為畢生之欣幸，先生謝世忽聞數月，思慕之情彌篤，爰誌數語，謹表哀悼之忱。（一九五七年一月）」若林正丈曾以此題材發表〈台湾との関わり：花瓶の思い出〉，收於鴨下重彦等編《矢內原忠雄》一書。參見若林正丈，〈矢內原忠雄と植民地台湾人：植民地自治運動の言説同盟とその戦後〉，《Odysseus／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紀要》14（2009年3月），頁7-33；若林正丈，〈台湾との関わり：花瓶の思い出〉，收於鴨下重彦等編，《矢內原忠雄》（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頁108-129。

¹²² 1929年3月林獻堂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到東京，拜會矢內原忠雄，並與其在燕樂軒用餐，日記並未記載言談內容。1934年4月會面，日記記載矢內原忠雄有關滿洲問題的言談。1937年10月，蔡培火陪同林獻堂會晤矢內原忠雄，日記記載矢內原忠雄關於七七事變後的言談。12月21日，日記則記載林獻堂要贊助矢內原忠雄。12月27日，林獻堂在東京山水樓餐廳宴請矢內原忠雄，出席者有蔡培火、林攀龍、高天成、岩波茂雄、陳茂源、吳三連、與劉明電等人。

¹²³ 包括1929年3月11日、1934年4月4日於東京帝國大學矢內原忠雄研究室；1937年10月6日於東京自由ヶ丘矢內原忠雄住宅，同年12月21日於東京林獻堂住宅，12月27日於東京山水樓餐廳；與1951年5月27日於東京矢內原忠雄住宅。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七）、（九）、（廿三）》，1929年3月11日，頁82；1934年4月4日，頁135；1937年10月6日，頁348；1937年12月2日、27日，頁413、420；1951年5月27日，頁209。

從死裏獲得重生。」¹²⁴ 言論不容於當局與軍警，最後他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職位。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九）》於1937年12月21日記載矢內原忠雄與蔡培火一同來訪，「矢內原忠雄為反對戰爭之演講，旬日前被逼辭退帝大教授，此後將專力於研究，余許援助其費用之一部分，特來道謝也。培火與之同來，談論數十分間乃去。」¹²⁵ 1938年1月8日日記記載，他將以每年5百日圓贊助矢內原忠雄10年，同年4月5日記載，蔡培火來訪說矢內原忠雄已於1月領收250日圓，但他找到其他補助來源，辭謝林獻堂後續的好意與金額。¹²⁶ 戰後，東京大學於1945年11月復聘矢內原忠雄為教授，1951-1957年他曾任東京大學總長。

〈長與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記載了矢內原忠雄辭退事件的相關史料。¹²⁷ 長與又郎於1937年11月開始記錄該事件，直到12月1日。矢內原忠雄於1937年11月30日提出辭呈，12月1日的日記記載「揮淚斬馬稷（泣いて馬稷を斬る）」。¹²⁸ 11月24日經濟學部教授會議，在討論完第一個議案後，學部長（系主任）土方成美提案檢討矢內原忠雄於《中央公論》發表的文章〈國家の理想〉，出席者多批判該文，11月25日日記記載希望經濟學部教授會議要能「自重」。11月26日，長與又郎與前總長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學者）討論經濟學部問題1小時。11月27日，《東京朝日新聞》報導文部省忽略處理東京帝大二、三位教授與學生不當戰爭言論的問題，同日經濟學部大內兵衛、舞出長五男、與森戶辰男向總長陳情經濟學部的問題，他們是矢內原忠雄志同道合的同事；同日文部大臣木戶幸一也約談長與又郎，長與又郎在日記裡記載他向強壓態度的木戶，表達請文部省尊重大學自治精神。當日長與又郎回到學校後，約見土方成美，告知他11月24日經濟學部教授會議提案檢討矢內原忠雄處理不當，希望土方和平處理此案，但他面有難色，說系上仍有老師持強硬處理的意見。長與又郎的日記記載了他對經濟學部的看法，認為經濟學部內部紛爭與派系群雄割據的問題由來已久，應從根本解決，困難重重。11月28日，大內兵衛來見長與又郎，轉交矢內原忠雄親筆信，向他表達處理方式致謝意，當日日記記載，在外部壓力策謀

¹²⁴ 譯文引用出自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三）》，1951年5月27日，頁210，註4。

¹²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12月21日，頁413。

¹²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1月8日、4月5日，頁7、87。

¹²⁷ 照沼康孝、中野実，〈長與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頁27-64。

¹²⁸ 照沼康孝、中野実，〈長與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頁49-55。

呼應下，他無法忍受大學自治遭破滅。11月29日，文部省官員、經濟學部教授、與法學部教授來拜訪，系主任土方成美長和長與又郎意見對立，長與又郎在日記中記載他向他們表達矢內原忠雄是優秀的學者並懷抱自由的思想，其言論是愛國憂國的情操，大學應是多樣化而非偏狹的統一意見，否則其學問自由將會沒落。11月30日，文部大臣木戶幸一、伊東次官、菊池教學局長官、山川專門局長等會談文部省處理原則。12月1日，矢內原忠雄自動請辭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職位，當日日記記載，矢內原忠雄是有能力的學者，請辭是學校的一大損失，但此事件絕非無意義的結束，大學自治與自由需要全體教授協力護持。

照沼康孝即是使用長與又郎的日記史料，探討還原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當時處理矢內原忠雄事件的過程，以及接續總長的處理。¹²⁹ 平賀讓為長與又郎之後的東京帝國大學第13代總長並獲軍方支持，上任後將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自由主義派領袖）與土方成美（國家主義派領袖）分別先後停職處分，理由是「表現不適格」、「思想不適格」，引起系上動盪、教師不滿而跟進請辭，為「平賀肅學」事件。¹³⁰ 鴨下重彥撰〈昭和初期からの風雪の人〉一文，¹³¹ 則從長與又郎的日記中，提到其擔任總長任內，陸續遭遇矢內原忠雄事件、荒木貞夫文部大臣人事干涉等問題而苦惱焦慮。

朱昭陽於1925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曾親炙美濃部達吉與矢內原忠雄的授課，他回憶當時「日本的學校，尤其是大學，有不歡迎警察機關干預校務的傳統與習慣，校內行政也不歡迎外來力量的干涉；東大、京大的總長、部長（院長）早就由教授會選出，維持學校的傳統，維護學術的自由。」¹³² 在軍國主義威權下，如何維持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是長與又郎任內面對的問題，最終結果是他辭職下台。面對總長任內的種種事件，「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出來」。¹³³

¹²⁹ 照沼康孝，〈東京帝大経済学部問題と長与又郎：長与又郎日記を中心に〉，頁81-92。

¹³⁰ 〈第三章 河合、土方兩教授の休職と「平賀肅學」〉，帝國大學學友會編，〈帝國大學大觀〉（東京：該會，1939），頁113-114。

¹³¹ 鴨下重彥，〈昭和初期からの風雪の人〉，收於鴨下重彥等編，〈矢內原忠雄〉，頁2-67。

¹³²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30。

¹³³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

(三) 劉瑞恆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的相關史料

劉瑞恆(1890-1961)1949年4月來臺，歷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與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暨駐華代表；美國醫藥援華會對戰後臺灣的醫學與護理教育、臺大醫院、臺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學校衛生及衛生教育等都有重大的影響。¹³⁴ 劉瑞恆亦曾任協和醫學院院長、協和醫院院長、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南京中央政府衛生部次長與代理部長；1930-1935年任衛生部部長，1935-1938年任衛生署署長，身兼醫療、醫學教育、衛生行政等方面最高機構之負責人。¹³⁵ 〈長與又郎日記〉也記載了諸如有關劉瑞恆任職衛生部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期間的史料。

1929年12月19日記載：

〔昭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Rajchman 自上海發電報。因為在長崎會面的時間無法配合，希望改在上海做招待。(略)。三點，由傳研出發到內務省，跟赤木局長磋商關於如何回覆 Rajchman 之事宜。

〔昭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土

上海 Rajchman 氏より電報あり。長崎にて落合うの時日を見出し難きにより、上海へ invite したしとのことなり。(略)

三時、傳研より内務省に至り、赤木局長と Rajchman 氏へ回答に付、協議す。¹³⁶

¹³⁴ 劉瑞恆，1906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1909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理學士學位，1913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13-1915年美國波士頓市立醫院實習醫師，1915-1918年中國哈佛醫學院外科教授，1918-1922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外科醫師，1922-1926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外科副教授，1924-1926年協和醫院代理院長，1926-1934年協和醫院院長，1926-1928年中華醫學會理事長，1928-1929年南京中央政府衛生部次長，1929-1930年代理衛生部部長，1929-1938年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1930-1935年衛生部部長，1935-1938年衛生署署長，1946-1949年美國醫藥援華會主任。1949年4月來臺，歷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暨駐華代表，1959年赴美接受治療，1961年8月26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參見〈劉瑞恆學經歷簡表〉，收於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¹³⁵ 劉士永，〈延續或斷裂？1940-50年代臺灣的公共衛生〉，收於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358；John R. Watt, "J. Heng Liu and ABMAC," in John R. Watt, ed.,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50-2000: How Medical Leaders in Taiwan, with the Aid of American Medical Advisors, Built a Modern, Health-oriented Society in Post-war Taiwan* (New York: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 2008).

¹³⁶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386。

1929年12月19日日記寫道，國際聯盟衛生部部長 Rajchman（拉西曼）電報邀請長與又郎赴上海商議，¹³⁷ 下午3點內務省赤木局長至傳染病研究所，同意長與又郎回覆前往。

12月24日記錄：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上海行

晚上九點四十五分由東京車站出發，前往上海。（略）。

二十七日下午三點抵達上海。晚上跟 Rajchman 討論國際聯盟的相關事宜，以及自四月七日開始為期三天的癩會議，並討論了主要的出席人選。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火

上海行

夜九時四十五分東京駅発、上海行の途に上る。（略）

二十七日午後三時に上海に着いた。その夜ライヒマンと国際聯盟関係の打合せを行い、癩會議の期日は四月七日より三日間とし、主要な出席者についても検討を加えた。¹³⁸

1929年12月24日日記寫道，他在晚上9時45分從東京車站出發前往上海，27日下午3時抵達，晚上與拉西曼商議國際聯盟之事，以及討論明年4月7-9日癩會議的主要出席名單。長與又郎曾於1928年出席國際聯盟於巴黎舉辦的癩預防會議。

12月28日日記寫道：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海）

早上十點，於 Palace Hotel 拜訪 Rajchman（他今年九月開始受聘為中國政府衛生部顧問），與宮島（幹之助）先生一起請教 Rajchman 對中國的看法，以

¹³⁷ Ludwik Rajchman（拉西曼）為細菌學家，英國倫敦大學教授，並為國際聯盟聘為專家，為國際聯盟（國際聯合會）衛生部部長（日本翻譯為保健部部長，有的論文寫衛生股股長），1929年1月31日國民政府衛生部長薛篤弼致書拉西曼聘其為衛生部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功能為顧問性質，對衛生部長提供建議。

¹³⁸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386-387。

及其與衛生部的交涉情形、並詢問他有關聯盟的方針等。談話中的主要內容如左列。

- 日、美、英、法、德等學派的混淆與對立。
- 若要提升衛生狀態，先要從醫學教育提升著手。
- 學校與研究成果無可觀之處。雖然也有一兩個尚可的，但那也全都是外國人所經營指導的。
- 中國的教育（學校）都是依賴他人的東西。所以首先要先設立自己的優良學校。
- 不但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反而，不管什麼他們都會反對，也沒有執行教育部的命令。

◎結論 作為聯盟要在中國做甚麼好呢？並沒有任何的點子。

二十八日下午一點是 Rajchman 的招待會。

Hotel Majestic

陪賓 蔣夢麟（教育部長）（親美派 頑固）、劉衛生部長、Grant、嚴、金、朱、周、其他數人。

飯後與宮島先生一起，跟劉、嚴、金三位在其他的房間會談。我覺得這應該是劉先生希望的。

一 文化事業部的事項

劉 該事業部的工作，不需有太多分歧的發展，應該要專注集中（concentrate）會比較好。像中藥研究應是最重要且適當的問題吧。

我們 同感。日本這邊也當然希望支持中藥的研究。

劉 我認為像是現在正在美國的陳克恢（K. K. Chen），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irector of Laboratory of Lilly Company

是漢藥部研究部長的適任人選。

我們 這應該是非常適任的。日本也有像中尾萬三這樣優秀的學者在從事中藥研究。我們希望陳先生也能協同中尾先生等人一同執行。（略）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土 （上海）

午前十時、Palace Hotel に Rajchman 氏（この九月から支那政府の依頼によつて衛生部顧問となつている）を訪い、宮島（幹之助）君と共に同氏の支那觀及び衛生部との交渉、聯盟の方針等に就き、所見を聞く。談話中の主要点左の如し。

- ・日米英仏独学派の混在、對立。
- ・衛生状態の向上は先ず医学教育の向上より着手。
- ・学校見るべきものなし、研究亦然り。一二の稍可なるものは皆外国人の經營指導に在るものなり。
- ・支那の教育（学校）は凡て他力本願なり。先ず自ら良校を設立せよ。
- ・中央政府の命に従わず、却つて諸事攻撃を事として居ることなり。教育部の命令行われず。

◎結局 聯盟としては支那に於いて何をなすべきか名案なし。

二十八日午後一時 ライヒマン氏の招待会あり。

Hotel Majestic

陪賓 蔣夢麟（教育部長）（米派、頑固）、劉衛生部長、Grant、嚴、金、朱、周、外数人。

食後 宮島氏と共に劉、嚴、金の三氏と別室にて会談、蓋劉氏の希望による。

一 文化事業部の件

劉 該事業部の仕事を余り多岐に亙らず concentrate するがよろしからん、漢藥研究の如きは最も重要なる適當の問題ならん。

余等 同感、日本側でも勿論、漢藥研究には力を尽し度希望なり。

劉 目下滯米中の陳克恢（K. K. Chen）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irector of Laboratory of Lilly Company

の如き者は漢藥部研究部長として適任と思ひ。

余等 至極適任ならん。日本にては中尾萬三と云立派な学者が、之に従

事する由を聞いている。陳氏も中尾君等と協同してやられるようだと結構なり。(略)。¹³⁹

1929年12月24日，長與又郎前往上海與拉西曼會晤，討論與國際聯盟之間的關係，以及明年4月的癩病會議，¹⁴⁰ 拉西曼時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顧問，此外「文化事業部的事項」，則是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文化事業部要在上海創設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議題。12月28日，長與又郎與拉西曼會談要點為：中國衛生醫療方面，混雜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不同學派；¹⁴¹ 衛生醫療的提升要從醫學教育著手；學校教育與研究大都由外國人經營，需要自行建立優良學校等。此外，當天參加午宴的人士，有教育部長蔣夢麟、衛生部長劉瑞恆、嚴智鐘、金寶善等，¹⁴² 長與又郎對蔣夢麟的看法是頑固的親美人士。午宴後，劉瑞恆、嚴智鐘、金寶善等與宮島幹之助討論。¹⁴³ 劉瑞恆認為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文化事業部要在上海創設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中藥研究是最重要的議題，他並推薦陳克恢為「漢藥部研究部長」。陳克恢是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禮來公司實驗室主任（The Lilly Research Laboratories, Eli Lilly and Company,

¹³⁹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387-388。

¹⁴⁰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386-387。

¹⁴¹ 「近年以來，留學西洋某派之留學生與留學東洋之習醫者，其互相水火情形，確屬事實，此固無庸諱言，留學西洋某派之學生，每謂東洋留學生，多非大學畢業，而所入學校，又無理化生理等科，國內各醫校多為若輩所主持，程度本夠不上，無惑乎陷於停頓態度，此為若輩平日昔聞之語，不過藉博士之報告，以擴大宣傳耳，至東洋留學生，則又謂留學西洋某派之學生，在國內預備，本不充分，甚至中國文字，尚復不通，僅赴西洋二三年，歸來便稱博士，多無常識——況大學之種類甚多，任何可入，絕非難能可貴，又如病名藥名，為我中國固有者，亦復茫然無知，必以西語出之。」參見〈讀拉西曼調查中國醫事衛生報書後〉，《醫藥評論》38（1930年7月），頁16-19。

¹⁴² 嚴智鐘 1915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後進入傳染病研究所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學。1917年回國，先後任北平醫學專門學校細菌學教授、國民政府衛生部醫政司司長、衛生署技正、陸軍軍醫學校校長，來臺後任臺大醫學院細菌學科教授，曾為臺大醫學院第二任院長（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有關劉瑞恆的生平事績，參見前註135，並參閱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金寶善（1893-1984），浙江紹興人，公共衛生學家，留學日本千葉醫科專門學校並在東京帝國大學研究傳染病與生物製劑，1927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歷任衛生部保健司司長、衛生署副署長、署長、中央防疫處處長、與衛生部政務次長等職。參見李天霖、陳育德，〈為公共衛生事業奮鬥的一生：悼念金寶善教授〉，《北京醫學院學報》2（1985年2月），頁142；劉士永，〈延續或斷裂？1940-50年代臺灣的公共衛生〉，頁358；陳寄禪，〈追溯五十年來促進我衛生設施之關鍵事蹟〉（臺北：正中書局，1981）。

¹⁴³ 宮島幹之助（1872-1944）為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日本代表，曾任北里研究所副所長，並撰《北里柴三郎傳》。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森下薰是他在北里研究所時的弟子。

Indianapolis, Indiana, USA)。¹⁴⁴ 日方則提出中尾萬三為協同人選。¹⁴⁵

拉西曼於 1929 年 1 月 31 日受國民政府衛生部聘為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國際聯盟也同意其協助國府衛生部。¹⁴⁶ 拉西曼一行於 1929 年 11 月 9 日抵達上海，進行國民政府醫事衛生現況調查，包括衛生行政、醫學教育、防疫、港口檢疫、醫療等。劉瑞恆於 1929 年 12 月 26 日去函拉西曼，¹⁴⁷ 提議〈國民政府衛生部與

¹⁴⁴ 陳克恢（子振）（Ko-Kuei Chen）（1898-1988）是藥理學家、中藥研究專家，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18 年留學美國，1923 年取得威斯康辛大學生理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藥理系助教，一邊照料母親，1925 年返美，1927 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擔任同校副教授。1929-1963 年為美國禮來藥廠藥理研究部主任，1953 年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ASPET) president，1954 年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FASEB) president，1965 年獲得 Remington Honor Medal，1987 年 FASEB 將該會會議中心命名為「The K. K. Chen Auditorium」。參見 K. K. Chen, ed.,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Incorporated: The First Sixty Years 1908-1969* (Washington: Judd and Detweiler, 1969), p. 67; *1987 Annual Report,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pp. 6-7; 丁光生，〈陳克恢：國際著名藥理學家〉，《生理科學進展》40: 4（2009 年 4 月），頁 289-291。

¹⁴⁵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 387-389。中尾萬三（1882-1936），東京帝國大學畢業，1930 年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漢藥部長。

¹⁴⁶ 有關國際聯盟與國民政府的技術合作，參閱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一）〉，《時代公論》96（1934 年 2 月），頁 14-15；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時代公論》97（1934 年 2 月），頁 15-21；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三）〉，《時代公論》98（1934 年 2 月），頁 16-21；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四完）〉，《時代公論》99/100（1934 年 3 月），頁 11-16；吳秀峯，〈對於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感想〉，《中華週報（上海）》113（1934 年 2 月），頁 4-6；張力，〈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下（1986 年 12 月），頁 281-314。張力，〈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pp. 53-56;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中國與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的技術合作，最初是國聯衛生部長拉西曼於 1925 年訪問日本之際，非正式地被邀請到北平考察公共衛生。1926 年 4 月向國聯衛生委員會報告中國考察及與醫界領袖及政府人員談話經過，直到國民政府（簡稱國府）成立後，國聯曾於 1928 年兩次派代表到中國從事考察，第一次是國際勞工局長杜馬受邀去日本時，順道來華調查勞工狀況，第二次則為 1928 年底國聯副秘書長愛文諾以正式代表身分派赴訪華，國聯秘書彭費與吳秀峯隨行。愛文諾覲見蔣中正主席並與外交部長王正廷等晤談，1929 年 1 月 31 日國府由衛生部長發函，聘拉西曼為衛生部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雙方先從衛生醫療開啟合作。1929 年 9 月 14 日國府外交部長致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請國聯派公衛專家來華協助海港檢疫與衛生工作，此議題於 1929 年 9 月 19 日在國聯理事會會議討論，當時主席為英國外相韓森，主張與中國進行協助合作，會後委派國聯衛生組織衛生部長拉西曼、副部長布德路、與情報部吳秀峯赴華與國府洽談衛生合作計畫，並將於訪華後，呈報合作計畫報告給國聯衛生組織，研究可行性。因此拉西曼一行於 1929 年 11 月 9 日抵達上海。參見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一）〉，頁 14-15。

¹⁴⁷ 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頁 284；Ludwik Rajchman 著、國際聯盟事務局保健部編、同仁會譯，〈中華民國醫事衛生の現状：ライヒマン報告〉（東京：同仁會，1930），頁 5-6。

國際聯盟衛生組織合作提案 (Propos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並舉薦以下 4 名專家為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相關委員會合作委員：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為衛生及預防教育委員會委員、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暨中華醫學會會長林可勝為營養委員會委員、¹⁴⁸ 中央執行委員褚民誼為體育委員會委員、¹⁴⁹ 前中央防疫處長方石珊為社會醫學委員會委員等。¹⁵⁰

教育部長蔣夢麟並於 1929 年 12 月 27 日去函國際聯盟，請其派遣該衛生組織衛生部專家協助衛生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並計劃與國際聯盟合作衛生及預防醫學教育事宜。¹⁵¹ 這函文是長與又郎與蔣夢麟會面的前一天發出，蔣夢麟與劉瑞恆在會面前已經與國際聯盟達成合作共識，難怪長與又郎對蔣夢麟的看法會是頑固的親美人士。國際聯盟於 1930 年 5 月，聘任劉瑞恆為國際聯盟衛生委員會委員暨副主席，黃子方為國際聯盟衛生部醫官，林可勝、褚民誼、方石珊等為前述國際聯盟各委員會委員，嚴智鐘則為國際聯盟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¹⁵²

拉西曼在華考察衛生醫療後，於 1930 年撰寫〈與國民政府衛生部合作報告書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報告述職。¹⁵³ 1930 年 9 月應國民政府要求，拉西曼、施也舉、及吳秀峯等人再度訪華，考察衛生合作計劃進行進度，並尋求進一步合作的可能。1931 年 1 月 7 日國民政府函電，邀請國際聯盟財政經濟部長沙爾特 (Arthur

¹⁴⁸ 有關林可勝的論述，參見劉士永、郭世清，〈林可勝 (1897-1969)：闇聲晦影的中研院院士與國防醫學院院長〉，《臺灣史研究》19: 4 (2012 年 12 月)，頁 141-205。

¹⁴⁹ 褚民誼 (1884-1946) 自日本大學畢業後，前往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醫學院就讀，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立廣東大學醫學院教授與院長，汪精衛並將其義妹介紹許配予他，褚民誼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其後在汪精衛政權之新國民政府任行政院院長與外交部長，戰後褚民誼被國民政府處決。參見〈褚民誼〉，收於外務省東亞局編，《新國民政府人名鑑》(東京：該局，1940)，頁 5。

¹⁵⁰ 方石珊 (1884-1968) 留學日本千葉醫專門學校，學成回國，在北平開設首善醫院，發起成立平津防癆協會，推動北京與天津的防癆公衛。參見賀寶善，〈宣導公共衛生的方石珊醫生〉，《書屋》11 (2006 年 11 月)，頁 61-63。

¹⁵¹ Ludwik Rajchman 著、國際聯盟事務局保健部編、同仁會譯，〈中華民國醫事衛生的現狀：ライヒマン報告〉，頁 10。

¹⁵²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三)〉，頁 16。

¹⁵³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 no.: C. H. 906. Geneva, September 16th, 1930. League of Nations. Series of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ations. III. Health. 1930. III. 14., 1930. 該報告出爐後，日本同仁會即刻翻譯出版日文版本《中華民國醫事衛生的現狀：ライヒマン報告》。

Salter) 與交通運輸部長哈斯 (Robert Hass) 來華會商技術合作。¹⁵⁴ 國民政府與上述人士會商後，同年 4 月 25 日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致電國際聯盟，提議擴大正式技術合作事宜，5 月 18-23 日國際聯盟理事會會議討論通過國民政府提案，其中日本代表要求多用日籍人士參與此技術合作的在華建設工作。¹⁵⁵

國民政府於 1931 年 11 月 15 日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並規劃建設計畫。¹⁵⁶ 第一個三年計畫包括工程、教育、農業、工業、財政、與公共衛生及醫學等 6 大項目，公共衛生及醫學的項目，經行政院批准三年建設計畫，主要為設立中央衛生實驗區和中央醫院成為全國醫藥及衛生事務中心、創立實驗醫科學校與改良現有醫學專門學校、發展海港檢疫組織、全國新式衛生機關合作等。¹⁵⁷ 有關技術合作的成果，在公共衛生及醫學方面，國際聯盟職員吳秀峯述及「自從劉瑞恆博士任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之後，政府對於改良衛生之努力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見。」¹⁵⁸ 例如海關檢疫方面，由財政部海關（外國統轄）移交衛生部，代表主權收回，衛生部並已於 1930 年 7 月 1 日成立海港檢疫處，處長為伍連德。¹⁵⁹

三年建設計畫實施後，拉西曼於 1934 年撰寫〈國際聯盟對華技術代表報告書，從 1934 年 4 月 1 日任職起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agent of the Council on his mission in China,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until April 1st, 1934)〉報告書，內容涵蓋全國經濟委員會緣起、三年建設計畫的成果評估，包括農業、棉業、蠶絲業、水利、公路、公衛醫療與醫學教育、教育等方面，以及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對此計畫執行的績效評估，與後續計畫。¹⁶⁰ 日本也於同年立即翻譯出版該報告，¹⁶¹ 上海《銀行週報》也陸續刊載節譯的「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

¹⁵⁴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一）〉，頁 15。

¹⁵⁵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頁 15-16。

¹⁵⁶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p. 34.

¹⁵⁷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頁 15-18；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pp. 56-58.

¹⁵⁸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頁 19。

¹⁵⁹ 吳秀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頁 19。

¹⁶⁰ L. Rajchman,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agent of the Council on his mission in China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until April 1st, 1934*. (Series of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ations. General. 1934.1), League of Nations.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1934.

¹⁶¹ Ludwik Rajchman 著、國際聯盟事務局東京支局譯，《ライヒマン報告書：國際聯盟の対支技術援助に関する報告書》（東京：日本國際協會，1934）。

內容。¹⁶²

劉瑞恆撰〈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一文，¹⁶³ 主要說明三年建設計該報告的公衛醫療成果，包括行政工作、實驗工作、推廣工作、訓練工作等項目。

行政工作涵蓋醫政、保健、防疫、助產教育委員會、護士教育委員會。防疫方面，衛生署下設置海港檢疫處主管全國海港檢疫業務，當時完成接收辦理的地點為上海、廈門、汕頭、漢口、牛莊、安東、秦皇島、天津之大沽與塘沽等處。¹⁶⁴

實驗工作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下屬單位衛生實驗處管轄，包括：細菌及血清實驗室、化學實驗室、藥物研究室、瘧疾實驗室、原蟲實驗室、衛生工作室、生命統計室、模型室、攝影室、畫室、學校衛生室、病理實驗室、製藥廠及圖書室。也組成調查及研究機關：西北防疫處、清浦黑熱病研究隊、杭州防治住血蟲病隊、紹興肺蛭蟲調查隊、蕭山薑片蟲工作隊、衢縣防治住血蟲病隊、南京市生命統計聯合辦事處、與句容縣生命統計統計區等，並指導學校及農村衛生。¹⁶⁵

推廣工作則為實施省衛生計畫。¹⁶⁶ 訓練工作為辦理各種學校與訓練班，例如第一助產學校、中央助產學校、中央護士學校、中央醫院住院醫師訓練班、衛生稽查訓練班、公共衛生醫師講習班、公共衛生護士訓練班、及學校衛生講習班等。¹⁶⁷

1929年12月28日，長與又郎與拉西曼會談有關中國公共衛生醫療方面的缺失；經國民政府與國際聯盟技術合作執行三年建設計畫，已有不少成果與改善。

1929年12月31日條記：

¹⁶² 〈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一）〉，《銀行週報》18: 19（1934年5月），頁29-38；〈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二）〉，《銀行週報》18: 20（1934年5月），頁29-31；〈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三）〉，《銀行週報》18: 21（1934年6月），頁29-34；〈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四）〉，《銀行週報》18: 22（1934年6月），頁21-23；〈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五）〉，《銀行週報》18: 23（1934年6月），頁26-37；〈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六）〉，《銀行週報》18: 24（1934年6月），頁23-28；〈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七）〉，《銀行週報》18: 25（1934年7月），頁33-35；〈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八）〉，《銀行週報》18: 26（1934年7月），頁29-31。《銀行週報》是上海銀行公會於1917年創辦的近代第一份金融刊物。

¹⁶³ 劉瑞恆，〈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衛生半月刊》2: 1（1935年1月），頁1-12。

¹⁶⁴ 劉瑞恆，〈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頁1-2。

¹⁶⁵ 劉瑞恆，〈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頁2-3。

¹⁶⁶ 劉瑞恆，〈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頁4。

¹⁶⁷ 劉瑞恆，〈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頁6。

〔昭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 （上海）

整體來看，日本學派這邊是具有實力的，而且國語文的能力也高。歐美留學者則遜色許多，但是他們交際手腕卻比較高明。隨著政府內部的親美勢力越來越大，也漸漸朝向他們昂昂得意的時代前進。

七點出席了在余巖先生家舉辦，招待來自日本醫學界的餐會。與入倉二出席。（略）

〔昭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火 晴 （上海）

總じ日本学派の實力あり、且つ国文を能くす。歐米留学者は之等の莫大いに劣るも、交際游泳術等は上手なり。政府に於ける米國勢力大となるに従つて彼等は漸次得意の時代に向いつつあり。

七時余巖氏宅に於ける日本出身医学者の幹部招待会に出席、入倉二氏同席。（略）¹⁶⁸

1929年12月31日日記載明長與又郎對當時留學歐美與日本的民國人士之看法；晚上，留學日本的習醫者在余巖家中宴請長與又郎等人士。日記描述留學日本學派具備實力且精通日文，留學歐美者與之相比則較差，但交際手腕強，且國民政府中留美派勢力大，留學歐美者得意的時代即將來臨。〈讀拉西曼調查中國醫事衛生報書後〉一文，也表達對留學歐美與日本者的看法；¹⁶⁹ Ka-che Yip 敘述當時民國的醫學社群分為英美、德國、法國、與日本；¹⁷⁰ 劉士永撰〈延續或斷裂？1940-50年代臺灣的公共衛生〉一文，述說「一如臺灣衛生事業與日本帝國關係密切般，中國現代公衛與美國醫學人脈關係深厚不在話下。」¹⁷¹ 戰後臺灣大學醫學院也逐漸導向美式醫學教育。長與又郎所謂交際手腕強的看法，應是美式醫學教育注重表達與溝通；而傳統日式醫學教育，則是講究講座教授權威。

1930年1月1日記：

¹⁶⁸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389-390。

¹⁶⁹ 〈讀拉西曼調查中國醫事衛生報書後〉，頁16-19。參見註141。

¹⁷⁰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p. 140.

¹⁷¹ 劉士永，〈延續或斷裂？1940-50年代臺灣的公共衛生〉，頁358。

〔昭和五年正月元旦〕 星期三

元旦 離開上海（略）

此次的行程前後僅八天的時間而已，就已經與 Rajchman 商討了國際聯盟一事，也會見了民國衛生部及教育部的各重要人士、著名的醫學界人士，並彼此交換意見，也鞏固了彼此的利益。了解現今民國政府的教育及醫學衛生的一般方針，日本有必要針對這個問題考量其應對之方案。（略）

〔昭和五年正月元旦〕 水

元旦 上海を去る（略）

この行前後僅かに八昼夜、ライヒマン氏と国際聯盟関係の用件を用付、民国衛生部及び教育部の首脳諸氏、著名の医学者と会見して彼我意見を交換互しに得る処現今あり。現今の国民政府の教育及び医学衛生の一般方針を知るをて、日本の之に対する案を考慮するの要を感ず。（略）¹⁷²

長與又郎 1930 年 1 月 1 日離開上海回日本，日記中寫下他對此上海之行的看法。除了與拉西曼協議明年國際聯盟衛生會議，他與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衛生部部長、醫界領袖等會晤及意見交換，進一步了解國民政府教育與醫療衛生方針與計畫，感受到日本應考慮相對應的方案。飯島涉撰《感染症の中国史：公衆衛生と東アジア》書中論及在 1930 年代，國民政府衛生醫藥行政事業正展開制度化與法制化，從收回海港檢疫權、防疫、與傳染病預防條例公告執行等，然而，這樣的中國衛生事業制度化進程，卻被其後與日本之間的長期戰爭所阻撓。¹⁷³

〈長與又郎日記〉史料在國際聯盟技術合作方面的論文尚未被引用，關於國際組織援助等題材，長與又郎的日記內容，提供了國際聯盟與國民政府技術合作時期，相關日本人士對此事件的看法，使我們對歷史事件能有更多面向的理解，而能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此外，日記也提供有關中藥研究方面的史料。嚴智鐘與劉瑞恆，分別於 1947 年及 1949 年來臺，日記也提供上述兩人相關的參考史料。

¹⁷²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頁 390。

¹⁷³ 飯島涉，《感染症の中国史：公衆衛生と東アジア》（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9），頁 120。相關內文意義的理解，感謝本刊編輯的提點與指正。

（四）其他史料

除了本身病理學的專業外，長與又郎的日記中也記載癌研究會、傳染病研究所、東京帝國大學校務與教授晉升選舉等、關東大地震、金融危機、中日戰爭、國民政府、上海事變、七七事變、南京陷落、滿洲事變、滿洲國、汪精衛政權、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同仁會等。限於篇幅與個人專業領域，無法一一舉例說明與討論。

四、〈長與又郎日記〉材料的價值及其侷限性

使用〈長與又郎日記〉的侷限性，首先是語言與文本方面，其原文或印刷本，均以日文書寫，且與現行日文有時代的差距，對非熟悉日文者，在使用上造成不便。另外，日記的印刷本有誤植之處，例如崛口氏，應是堀內次雄；今（祐）為印刷本編輯誤植，應為今裕。此外，其日記書寫經常只記其姓、不記人名；外國人名或地名方面，有時寫片假名、有時為英文，例如拉西曼有時寫成ライヒマン、有時寫 Rajchman，因此研讀日記時，需比對、判讀相關人物資料。日記原文年號使用明治、大正、與昭和，閱讀時需轉換為西元紀年。

其次，其對人物的臧否，可能會讓讀者片面斷章取義，例如評論蔣夢麟「親美派、頑固（米派、頑固）」，「京都派的教授派系結黨旺盛（京都派の教授の党派根性の旺盛）」等，這僅是代表他個人當時書寫日記的感覺。

第三，單從日記有時無法了解整件事的始末全貌，必須找尋相關資料佐證，例如前述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矢內原忠雄辭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事件、或國際聯盟與日本、中國的技術合作。

第四，日記內容牽涉當時多位日本、歐美、與中國人士，需解讀註解，才易理解。

第五，文獻未顯示長與又郎來過臺灣，他對臺灣的理解並沒有第一現場的認知。但他透過殖民母國最高學府總長與醫學部長的推薦與相互交往關係，對臺灣醫學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例如 1937 年 10 月 25 日日記記載，永井潛將接任臺

北帝國大學第二任醫學部長職位，全家遷住臺北，永井向長與又郎告別。¹⁷⁴此外，有關永井潛任職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期間之事，長與又郎也曾記載於日記。

第六，長與又郎經常將日記當作備忘錄記載，例如前文 1929 年 12 月 28 日條記，當天的日記內容豐富，又因牽涉與多位人士會談，他將這些談話摘要記錄，方便日後翻閱參考。也因為他的此種做法，保存了相關事件的原始樣貌，使日記更具參考價值。

五、結論

本文從三個方面，初步分析〈長與又郎日記〉對臺灣史研究可提供的貢獻，文中初步爬梳整理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創立時，長與又郎對醫學部長人選與醫學部教授的遴選過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進而間接影響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術研究之發展，這段遴選過程在臺北帝國大學校史中尚未被記錄，由本文首次描繪。從日記中可以觀察，教授的遴選也並非只針對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人事，日記也揭露東京帝國大學與其他醫學院校等教授的遴選過程，都有長與又郎的身影。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位居日本醫學龍頭地位，從其日記中可窺見日本醫學門派運作一隅。¹⁷⁵

與臺灣淵源深的矢內原忠雄，日記也揭露其辭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事件之中，長與又郎的處理方式。日記資料中關於劉瑞恆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的技術合作，長與又郎也曾介入觀察中國公共衛生的發展，而關於這方面日本的角度，尚未有論述引用此日記史料內容。

余英時撰《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一書，引述《顧頡剛日記》「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¹⁷⁶長與又郎的社會角色具備多樣性，「事業心之強

¹⁷⁴ 照沼康孝、中野實，〈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頁 39。

¹⁷⁵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頁 156、173-175。

¹⁷⁶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頁 4。

烈」，從東京帝國大學病理講座教授、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長與總長、日本病理學會會長、癌研究會理事長與會長、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日本癌學會會長、帝國學士院會員、第4回極東熱帶病醫學會日本代表、洛克菲勒基金會醫學教育視察專家、國際聯盟衛生醫療會議日本出席代表、德國自然科學學士院院士、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帝國教育會名譽會員、財團法人結核研究所所長、財團法人肢體不自由者療護團會長、日本醫學會會長、男爵等職務，可以略知一二。¹⁷⁷ 雖然官方資料未顯示長與又郎來過臺灣，日記涵蓋時間為1893-1941年、約48年，幾乎與臺灣日治時期重疊；且由於長與又郎在近代史上所處的位置及重要性，他的日記或長或短記載了各式各樣的內容與研究參考的豐富史料，可以提供當時不同的歷史視野觀察，與未來臺灣學者可能的研究方向。

¹⁷⁷ 〈長與又郎年譜〉，頁345-357。

引用書目

《銀行週報》

樺山資紀，「台湾記事」（自筆4冊）與「日記」（墨書6冊），〈樺山資紀關係文書（その1）〉。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日本外科学会年表〉，「日本外科学会」，下載日期：2014年2月24日，網址：http://www.jssoc.or.jp/intelligence/meeting/mtg_soukai.html。

〈日本癌学会 長與又郎賞(長與賞)〉，「日本癌学会」，下載日期：2013年11月3日，網址：<http://www.jca.gr.jp/researcher/award/nagayo.html>。

〈学会の概要と構成〉，「日本結核病学会」，下載日期：2014年3月1日，網址：<http://www.kekkaku.gr.jp/about/index.html#syou>。

〈物故会員一覧(50音順)カ行〉，「日本学士院」，下載日期：2013年11月2日，網址：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bukko/k_gyo.html。

〈物故会員一覧(50音順)マ行〉，「日本学士院」，下載日期：2013年11月2日，網址：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b-ukko/m_gyo.html。

〈後藤新平(1857-1929)とは……〉，「藤原書店」，下載日期：2013年11月9日，網址：http://www.fujiwara-shoten.co.jp/shop/index.php?main_page=index&cPath=102_121。

〈宿題報告一覧(1911-61年分)〉，「日本病理学会」，下載日期：2014年2月24日，網址：<http://pathology.or.jp/jigyuu/lectures1911-61.html>。

Rajchman, Ludwik (著)、國際聯盟事務局東京支局(譯)

1934 《ライヒマン報告書：國際聯盟の対支技術援助に関する報告書》。東京：日本國際協會。

Rajchman, Ludwik (著)、國際聯盟事務局保健部(編)、同仁會(譯)

1930 《中華民國醫事衛生の現状：ライヒマン報告》。東京：同仁會。

丁光生

2009 〈陳克恢：國際著名藥理學家〉，《生理科學進展》40(4): 289-291。

三浦守治(著)、長與又郎(編)

1918 《三浦守治論文全集》。東京：日本病理學會。

1937 《三浦守治先生歌集：移岳集》。東京：東大病理五十周年記念會。

小田俊郎

1938 〈臺灣ニ於ケル結核ノ地理病理學的觀察〉，《結核》16(12): 1456-1484。

小田滋(著)、洪有錫(譯)

2009 《見證百年臺灣：堀内、小田兩家三代與臺灣的醫界、法界》。臺北：玉山社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高健

2012 《長与又郎：日本近代医学の推進者》。新潟：考古堂書店。

山極勝三郎

- 1913 〈本誌創刊以來ノ本邦病理學ノ沿革及發達（本邦病理學病理解剖學廿五年史）（附二圖）〉，收於望月泰三編，《東京医学会創立廿五年祝賀論文（第1輯）》，頁53-111。東京：東京医学会事務所。

中野実、照沼康孝

- 1991 〈長與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九月〉，《東京大学史紀要》9: 49-59。

中野実、照沼康孝、清水康幸

- 1992 〈長與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十月〉，《東京大学史紀要》10: 47-70。

内村祐之

- 1967 〈わが歩みし精神医学の道（11）：3人の人物 長與又郎・清野謙次・大川周明〉，《精神医学》9(5): 376-383。

天野郁夫

- 2013 《高等教育の時代（上）：戦間期日本の大学》。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日本病理学会（編）

- 1966 《日本病理学会50年史（下巻）》。東京：南山堂。

日本解剖学会百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記念出版委員会百年史担当委員会（編）

- 1995 《日本解剖学会百年のあゆみ》。東京：日本解剖学会。

毛受英次

- 1975 〈追憶〉，收於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会編，《河石九二夫》，頁204-206。広島：広島大学医学部第二外科同門会。

可知直三（編）

- 1939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業績集（第一、二巻）》。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

外務省東亞局（編）

- 1940 《新國民政府人名鑑》。東京：外務省東亞局。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

- 2001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

- 2006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09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矢内原忠雄

- 1929 《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

安井曾太郎

- 1942 《安井曾太郎肖像画集》。東京：造型藝術社。

有馬英二

- 1947 《肺結核の予後》。東京：日本医書出版。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

- 1994 《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臺北：前衛出版社。

何義麟

2011 《矢内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の台湾》》。臺北：臺灣書房。

余英時

2007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秀峯

1934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一）〉，《時代公論》96: 14-15。

1934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二）〉，《時代公論》97: 15-21。

1934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三）〉，《時代公論》98: 16-21。

1934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四完）〉，《時代公論》99/100: 11-16。

1934 〈對於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感想〉，《中華週報》113: 4-6。

吳奇浩

2012 〈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臺灣史研究》19(3): 201-236。

吳密察

1990 〈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頁149-175。臺北：稻鄉出版社。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

2007-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

2004 《呂赫若日記》。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李天霖、陳育德

1985 〈為公共衛生事業奮鬥的一生：悼念金寶善教授〉，《北京醫學院學報》2: 142-143。

和氣巖

1931 〈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一報告）：家兔に於ける實驗的 3-アスチール、ナボカイン及びアコニン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1: 622-632。

1932 〈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二報告）：家兔に於ける實驗的シトカイン及びホロカイン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2: 853-856。

1933 〈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三報告）：家兔に於けるアスチール及び爾他無菌靜毒の併用試驗〉，《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3: 920-923。

1934 〈所謂無筋靜毒を以てせる病理組織學的研究（第四報告）：猿に於ける實驗的 3-Astyl 中毒〉，《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4: 348-351。

1939 《剖檢示說（第一卷）》。臺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

和氣巖、松隈數馬

1938 〈二三の腦膜腦炎に於ける血行障礙ニ基く中樞神經組織內病變ニ就イテ〉，《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8: 391-398。

所安夫

1955 〈輓近 20 余年間の日本における病理學の發展と動向〉，收於日新医学協會編，《日本医学の發達》，頁 105-117。東京：日新医学本社。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教室五十三年史編纂會（編）

- 1943 〈三田定則先生小傳〉，收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五十三年史編纂會編，《東京帝國大學法醫學教室五十三年史》，頁 177-185。東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教室。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五十周年記念會（編）

- 1939 《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五十年史（上卷）、（下卷）》。東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五十周年記念會。

林吉崇

- 1997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林呈蓉

- 2003 〈樺山資紀「日記」與水野遵「臺灣征蕃記」的史料價值與意義〉，《臺灣史料研究》20: 156-17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主編）

- 2000-2004 《灌園先生日記（一）～（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 2004-2013 《灌園先生日記（九）～（廿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武田勝男（編）

- 1939 《今博士還曆記念誌》。札幌：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

武藤徹一郎

- 1990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收於東京大學病理學教室編，《東京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百周年記念誌》，頁 270-272。東京：東京大學病理學教室百周年記念會。

河石九二夫

- 1940 〈臺灣ニ於ケル地方病性甲状腺腫ニ就イテ〉，《臺灣醫學會雜誌》39(10): 1667-1728。

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会（編）

- 1975 《河石九二夫》。広島：広島大学医学部第二外科同門会。

金關丈夫

- 1929 〈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一）〉，《人類學雜誌》44(11): 519-546。

- 1929 〈生蕃人手足皮膚の理紋に就いて（二、完）〉，《人類學雜誌》44(12): 573-601。

金關丈夫、中野由巳

- 1930 〈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一）〉，《人類學雜誌》45(3): 95-117。

- 1930 〈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二）〉，《人類學雜誌》45(5): 183-200。

- 1930 〈完全なる紅頭嶼男子全身骨格の一例に就いて〉，《人類學雜誌》45(6): 220-241。

金關丈夫、中野由巳、谷口善之

- 1933 《組織學實習圖譜（上卷）》。東京：金原商店。

長與又郎

- 1939 〈交友三十年〉，收於武田勝男編，《今博士還曆記念誌》，頁 30-33。札幌：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室。

長與又郎（著）、小高健（編）

- 2001-2002 《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上）、（下）》。東京：学会出版センター。

長與博士記念會（編）

1944 《長與又郎傳》。東京：長與博士記念會。

長與專齋（著）、長與又郎（編）

1930 《松香私志 完》。東京：長與又郎。

1934 《松香遺稿》。東京：長與又郎。

帝國大學學友會（編）

1939 《帝國大學大觀》。東京：帝國大學學友會。

泉孝英

2009 《外地の医学校》。大阪：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

泉孝英（編）

2012 《日本近現代医学人名事典（1868-2011）》。東京：医学書院。

若林正丈

2009 〈矢内原忠雄と植民地台湾人：植民地自治運動の言説同盟とその戦後〉，《Odysseus／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紀要》14: 7-33。

2011 〈台湾との関わり：花瓶の思い出〉，收於鴨下重彦等編，《矢内原忠雄》，頁 108-12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范燕秋

2007 〈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師大臺灣史學報》1: 89-136。

2010 《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第2版。

范燕秋（編）

2011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家永三郎

1962 〈大学自治の歴史的考察：大学管理制度と学問の自由との関連を中心に〉，《思想》459: 99-116。

1962 《大学の自由の歴史》。東京：塙書房。

容世明

2013 〈今裕：日治時期曾在臺灣服務過的病理醫師中，第一位獲得帝國學士院賞與擔任北海道帝國大學校長〉，《臺灣病理學會會誌》4(1): 75-79。

馬 偕（著）、陳宏文（譯）

1996 《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出版社。

高銘都

1987 〈漫談病理科 42 年 8 個月〉，收於國立臺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編，《臺大病理學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237-24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病理學研究所。

張 力

1986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下: 281-314。

1999 《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秀蓉（編註）

2012 《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淑雅

2011 〈蔣介石一瞥：1950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18(1): 185-216。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

2000-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曹永洋

1996 《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臺北：前衛出版社。

莊勝全

2013 〈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臺灣史研究》20(3): 207-220。

許雪姬（主編）

2008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天機、李鎮源

1995 〈法醫學者：三田定則教授〉，收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編，《臺大醫院百年懷舊》，頁 1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茂源

1952 〈譯者跋〉，收於矢內原忠雄著、陳茂源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301。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寄禪

1981 《追溯五十年來促進我衛生設施之關鍵事蹟》。臺北：正中書局。

飯島涉

2009 《感染症の中国史：公衆衛生と東アジア》。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黃子寧

2008 〈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1945）〉，收於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 675-72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08-2013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楊基振（著），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

2007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下）》。臺北：國史館。

照沼康孝

1990 〈東京帝大経済学部問題と長与又郎：長与又郎日記を中心に〉，《東京大学史紀要》8: 81-92。

照沼康孝、中野実

1983 〈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二年十月～十二月〉，《東京大学史紀要》4: 27-64。

1987 〈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六月〉，《東京大学史紀要》6: 32-51。

1989 〈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七月〉，《東京大学史紀要》7: 93-108。

1990 〈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八月〉，《東京大学史紀要》8: 119-140。

照沼康孝、中野実、前田一男

1986 〈長与又郎日記 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月〉，《東京大学史紀要》5: 39-86。

葉曙

- 1935 〈Über die allerische Gewebsreaktion der Lunge〉，《日本病理學會會誌》25: 183-194。
1970 《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葉榮鐘

- 1995 《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葉榮鐘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葉碧苓

- 2010 《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廖振富

- 2011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 201-239。

廖振富、張明權

- 2013 〈〈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3): 125-175。

劉士永

- 2011 〈延續或斷裂？1940-50年代臺灣的公共衛生〉，收於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頁353-388。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劉士永、郭世清

- 2012 〈林可勝（1897-1969）：闇聲晦影的中研院院士與國防醫學院院長〉，《臺灣史研究》19(4): 141-205。

劉似錦（編）

- 1989 《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劉瑞恆

- 1935 〈三年來中央衛生設施概況〉，《衛生半月刊》2（1）：1-12。

劉麗娜

- 1989 〈臺灣科學的一種開始及其歷史轉折：以體質人類學及蛇毒研究之發展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歐素瑛

- 2006 《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鄭麗玲

- 2001 〈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橋本義雄

- 1975 〈河石先生と私〉，收於河石九二夫先生回想誌編集委員會編，《河石九二夫》，頁153-163。広島：広島大学医学部第二外科同門会。

賴玉玲

- 2010 〈日治臺灣社會菁英的文明觀與文化認同：黃旺成的醫療經驗觀察（1912-1921）〉，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

鴨下重彦等（編）

2011 《矢内原忠雄》。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戴国輝

1972 〈近代日本と中国（4）：樺山資紀と水野遵〉，《朝日ジャーナル》14(5): 31-38。

簡吉（著）、簡敬等（譯）、陳慈玉（校注）

2005 《簡吉獄中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瀧澤利行

2003 〈書籍紹介 小高健編《長與又郎日記：近代化を推進した医学者の記録》〉，《日本医史学雑誌》49(2): 387-389。

Aoki, Kunio 青木國雄

2001 “Contributions to Cancer Preven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2. The Dawn of Cancer Control Activities: Comparison of Japan and the USA.”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2(1): 15-26.

2006 “Early History of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in Japan.”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7(2): 170-176.

Chen, K. K. 陳克恢

1969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Incorporated: The First Sixty Years 1908-1969*. Washington: Judd and Detweiler.

Kawaishi, Kunio 河石九二夫 and Yoshio Hashimoto 橋本義雄

1941 “Endemic Goiter in Japan.” *Annals of Surgery* 113(4): 481-495.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30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 no.: C. H. 906. Geneva, September 16th, 1930. League of Nations. Series of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ations. III. Health. 1930. III. 14.

Liu, Michael Shiyung 劉士永

2009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Lo, Ming-Cheng M. 駱明正

2002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kahara, Waro 中原和郎

1941 “MATARO NAGAYO.” *Science* 94(2447): 479-480.

1974 “A Pilgrim’s Progress in Cancer Research, 1918 to 1974: Autobiographical Essay.” *Cancer Research* 34: 1767-1774.

Rajchman, L. 拉西曼

1934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agent of the Council on his mission in China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until April 1st, 1934*. (Series of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ations. General. 1934.1), League of Nations.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1934.

Tien, Hung-Mao 田弘茂

1972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ke, Iwao 和氣巖

1942 “Über pathogenetische Fragen der örtlichen elektiven Vulnerabilitä im Zentralnervensystem.”
Transactiones Societatis Pathologicae Japonicae 32: 577-682.

Watt, John R. (ed.)

2008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50-2000: How Medical Leaders in Taiwan, with the Aid of American Medical Advisors, Built a Modern, Health-oriented Society in Post-war Taiwan*. New York: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

Yip, Ka-che

1995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Research Value of “Diary of Mataro Nagayo”: Reflections on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 and Modern History

Shih-ming Jung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iary written by Mataro Nagayo, this article traces and analyzes the medical history of Taiw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Mataro Nagayo (1878-1941) was the third son born to Sensai Nagayo. In 1904, he graduated from the Medical College of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After train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t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furthered his studies in pathology at the Freiburg University under Rudolph Aschoff from 1907 to 1909. He obtained his M.D. in 1911 and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in Pathology at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he same year. He had bee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ancer Society. He served as the Dean of Faculty of Medicine from 1933 to 1934 an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from 1934 to 1938. In 1936, he was elected fellow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Mataro Nagayo died on Aug 16, 1941.

Mataro Nagayo began writing his personal diary on Jan 1, 1892 at the age of 15. The surviving diary of Mataro Nagayo, owned by his family, spanned from Aug 17, 1893 to Aug 15, 1941. The diary was first serially released in periodicals between 1983 and 1992, and the “Diary of Mataro Nagayo” was eventually published in 2000-2001.

Through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s narrated by Mataro Nagayo in his personal journal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issues including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2) the events leading to resignation of Tadao Yanaihara, and (3) collaboration with Dr. J. Heng Liu from China and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Keywords: Diary,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Mataro Nagayo, Tadao Yanaihar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